

暗物质追踪 60 年辩驳“僵尸”论

李升绯

Recommended: 王德奎, y-tx@163.com; 张洞生 (Zhang Dong Sheng), ZDS@Outlook.com

Abstract: 把物质可分记为 P, 把物质无限可分记为 NP. $P = NP$ 还是 $P \neq NP$, 曾经既是一道数学难题, 又是一道政治难题, 由此产生的物质无限可分敬畏, 才形成了 60 年暗物质追踪的故事。如果有的东西就一定有限, 无限的东西才是无限的话, 就有两种情况: 一是时间是可以无限循环的, 有与无也可以无限循环。二是时间是进入到“无”, 就是没有时间, 停止时间是绝对的无, 无限循环没有了。这只能是从开始, 探索的起点, 用非常深刻的理论, 才能解决。这里, 非计算机专业的理工类, 能看懂; 计算机专业的, 更能透彻地看懂。因为要计算或解决一个问题, 该问题通常有一个大小规模, 用 n 表示, 分析计算一个二进制数, 该数有多少位, 这个位就是其大小规模。从 n 个数里面找出最大的那个数, 这个 n 就是该问题的规模大小。这是要比较 $n-1$ 次才能得到结果, 这个 $n-1$ 就是所花的时间, 也就是时间复杂度。再如将 n 个数按从大至小排序, n 是其规模大小, 第一次从 n 个数里找最大, 第二次从 $n-1$ 个数里找最大, 以此类推, 需要的比较次数就是 $n(n-1)/2$; 称所用 $n(n-1)/2$ 。为该算法的时间复杂度。

[李升绯. 暗物质追踪 60 年辩驳“僵尸”论. *Academ Arena* 2015;7(12):3-21]. (ISSN 1553-992X). <http://www.sciencepub.net/academia>. 2. doi:10.7537/marsaaj071215.02.

Keywords: 物质; 时间; 无限可分; 数; 复杂度

李世春, 1956 年生, 山西浑源人。中国石油大学(华东)机电工程学院教授, 博士生导师。1977 年考入吉林大学物理系, 1982 年本科毕业到华东石油学院基础部物理教研室工作。1988 年获吉林大学固体物理学硕士学位, 回到石油大学机械系从事材料的科研和教学工作。2001 年获清华大学材料学博士学位。

从物质无限可分敬畏到魔方

把物质可分记为 P, 把物质无限可分记为 NP. $P = NP$ 还是 $P \neq NP$, 曾经既是一道数学难题, 又是一道政治难题, 由此产生的物质无限可分敬畏, 才形成了 60 年暗物质追踪的故事。这里首先联系李世春教授的玩魔方。

李世春教授说: “那些眼花缭乱玩魔方复位的人, 他们可以完全不懂数学。但是他们站在经验归纳魔方复位公式的人的肩膀上, 几秒或十几秒就可以把随意搅乱的魔方复位, 他们靠的是: 70% 的记忆力和 30% 汗水”。把魔方搅乱是一个物理过程, 把搅乱了的魔方复位也是一个物理过程。描述魔方转动的数学模型是否到位, 评判的标准, 是所建立的魔方数学模型是否有利于计算机编程。三阶魔方可转动出的状态数约为 4.3×10^{19} , 如果用每秒百万亿次的上海“魔方”号计算机来清点魔方的状态, 需要约 120 小时。如果用中国天河二号计算机(每秒计算 33.86 千万亿次)来清点三阶魔方的状态, 仅需要 21 分钟。但四阶魔方的状态数约为 7.4×10^{45} , 如果用天河二号计算机来清点四阶魔方的状态, 需要约 6.93×10^{21} 年, 宇宙的年龄不到 200 亿 (2×10^8) 年, 用世界上最快的计算机来清点也是

根本不可能完成的。

把搅乱了的转座子格面图案或颜色, 在短时间复位到一个指定的转座子格面图案或颜色, 这一般太难。计算复杂性理论最成功的成果之一是 NP 完备理论。NP 是指“在非确定性图灵机上有多项式时间算法的问题”的集合, 而 P 是指“在确定性图灵机上有多项式时间算法的问题”的集合。计算复杂性理论, 为计算复杂性中的核心问题 P 与 NP 的关系指明了方向。对于难度较大的 NP 算法问题, 计算步骤的数量会随着输入数字的大小以 $2n$ 的方式逐渐增长。计算复杂性理论的新突破, 是随着信息输入量的增大, 复杂性理论要解决的关键是如何利用有效算法, 解决一些计算上的问题。在计算中, 计算步骤会随着数字的大小而缓慢增多; 假设在计算机中输入一个数字 n , 那么计算机的计算步骤就是 n^2 。

再说 P-NP 问题, 一是要求证明“简单多项式 (P) 与复杂多项式 (NP) 具有相同的计算时间”。目前环绕这个问题的大量学术论文和研究专著, 已使它发展成为计算机科学中最新和最活跃的研究。例如, P 问题为 NP 问题的一个子类, 人们极感兴趣的是前者在后者中占据多少分量? 如考虑二者是否重合, 至今也还悬而未决。P/NP 问题中包含了复杂度类 P 与 NP 的关系, 如是否两个复杂度类 P 和 NP 是恒等的 ($P=NP?$), 或 P 和 NP 相等吗? 把物质可分记为 P, 把物质无限可分记为 NP, 问题较难求解(NP), 但容易验证(P)和我们日常经验是相符。而从另一方面, 过于相信 $P \neq NP$, 也应该去寻找 $P = NP$ 的证明。倾向 $P \neq NP$ 的主要论据, 是在

穷尽搜索的领域完全没有本质进展。一个很弱的论据，是物质无限可分，分了还是物质，类似“0”无限可分，分了还是“0”，等于没有可分。

这里“0”类似“无”，无中生有，“0”类似“0”量子力学。用数字“0”推演“无和有”、“连续与间断”，由于所有自然数的正、负相加等于0，所有实数的正、负相加等于0，所有虚数的正、负相加等于0，这样去联系“真空量子起伏”、“测不准原理”到我国古代的“无中生有”、“物质无限可分”学说，就有类似量子起伏、连接场、平行宇宙论的问题。就说现代物理是讲粒子和场，算术代数中“0”对应所有正负数相加，把宇宙分割为“粒子”和“场”两部分：“场”可以是“0”的多数对“量子起伏”。这是一种虚拟的类似虚数的多宇宙，开始是虚实的一对一，然后是一对多，多对一。最后是多对多，形成“有”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与0维生一维，一维生二维，二维生三维同构，而类似连接场的虚实互动、互生、互存的平行宇宙、多元宇宙。由此可以推导出：平行宇宙=正物质宇宙+i 虚拟物质宇宙。其次，从费曼图对高能粒子非弹性散射对撞实验的分析，这里每次散射实验的结构信息，还有并不一样的。这种算法的空间是很大的。

如果有的东西就一定有限，无限的东西才是无限的话，就有两种情况：一是时间是可以无限循环的，有与无也可以无限循环。二是时间是进入到“无”，就是没有时间，停止时间是绝对的无，无限循环没有了。这只能是从开始，探索的起点，用非常深刻的理论，才能解决。这里，非计算机专业的理工类，能看懂；计算机专业的，更能透彻地看懂。因为要计算或解决一个问题，该问题通常有一个大小规模，用 n 表示，分析计算一个二进制数，该数有多少位，这个位就是其大小规模。从 n 个数里面找出最大的那个数，这个 n 就是该问题的规模大小。这是要比较 $n-1$ 次才能得到结果，这个 $n-1$ 就是所花的时间，也就是时间复杂度。再如将 n 个数按从大至小排序， n 是其规模大小，第一次从 n 个数里找最大，第二次从 $n-1$ 个数里找最大，以此类推，需要的比较次数就是 $n(n-1)/2$ ；称所用 $n(n-1)/2$ 。为该算法的时间复杂度。

对于时间复杂度当 n 足够大时，只注重最高次方的那一项，其他各项可以忽略，另外 $n(n-1)/2$ 只重视 n 的平方这一项，记为 $O(n^2)$ （ n 的平方）。该算法对该问题的时间复杂度的专业表示，如 $a*n^k+b*n^{(k-1)}+c*n^{(k-2)}\dots$ 都可记为 $O(n^k)$ ， n^k 表示 n 的 k 次方，*为乘号，这样的复杂度称为多项式时间复杂度。若是时间复杂度形如 k^n ， k 为大于1的常数，或 $n!$ ，或更大的，就称为指数型时间复杂度。当 n 足够大时，指数型时间比多项式

要大得多的多。所有能用多项式时间算法计算得到结果的问题，称为多项式问题，也就是P；所有绝对不可能用多项式时间求解的问题，称为指数型问题。还有假使有人得到了问题的解，但我们要验证他的解是否正确，所花的时间是多项式，至于求解本身所花的时间是否是多项式不管，可能有多项式算法，可能没有，也可能是不知道，这类问题称为NP问题。

NP概念的奥妙在于，它躲开了求解到底需要多少时间这样的问题，而仅仅只是强调验证需要多少时间，从而为P与NP这难题的产生埋下了伏笔。如果P肯定是NP，因为他既然能用多项式求解，就肯定能用多项式验证；如不成你也可再算一遍，但NP是否是P谁也确定不了。另外很明确的指数型问题，也肯定不是NP。可见NP的概念很抽象，针对NP最显著的特点有两个，一个是分步及每一步的并行性，二就是任何NP问题都可转化为是和否的问题。这对只学“以苏解马”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不知原旨原味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人，看懂就不一定了。由于没有理解P和NP的实质，仅仅只是知道关于确定性和非确定性图灵机、语言、空间等概念，在没有理解透概念时，作无谓的倒腾，以为“物质无限可分”这种概念的文字表述所指，就是“以苏解马”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说了算的范畴，能得出P等于NP的结论，这莫非这真有俗话说说的“没学会走路就想跑”的情况。

2015年11月第六届世界中国学论坛在上海国际会议中心召开，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中国研究系主任蓝普顿教授说：“1972年到1973年，我在香港工作，当时接触到的人只是文革期间从大陆过去的人群，人员和信息都是有限的。从毛泽东和尼克松握手后，到邓小平指挥改革，中国变化很大。1982年，我在武汉学习中国的水利调查，感觉到中国太大，要处理的问题太多，非常不容易，当时中国还是个农业大国。而现在，中国的城市化率已经达到了60%，就上海而言，人口也增长了2倍，互联网等都蓬勃发展。”多年的研究，给他的体会是，“始终不变的是中国问题一直很复杂。”这也说到了新中国从物质无限可分敬畏到暗物质产生的起源，和对暗物质的敬畏过程很复杂的中国问题上。因为物质无限可分，分了还是物质，等于没有可分。但物质无限可分可以一分为二，即物质可分为显物质和暗物质。这两者之间存在的界面分隔，可以类似自然数、实数与虚数，两者是无限可分的，但又是不可分的。“以苏解马”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不了解 $P=NP$ 还是 $P\neq NP$ 数学线性中的非线性复杂性，就会出“没学会走路就想跑”的情况。

粃粃不要米做吗？李世春教授说：“科学的模型和模型的科学 $N \times N \times N$ 魔方复位，网络证据表明，有魔方爱好者能够轻松地把 $7 \times 7 \times 7$ 魔方复位。而目前还没有设计和制造出 $9 \times 9 \times 9$ 和更高阶的魔方，以实践（转动魔方）为主的魔方爱好者，就无法用直觉能力来探索更高阶魔方的复位问题。但用数学的方法却不受限制，想走多远就走多远。因此，数学永远是领头科学”。新中国从物质无限可分敬畏到暗物质产生的起源，和对暗物质的敬畏过程，就是这样。但李世春教授也说：遗憾的是，高水平的数学家把数学高度抽象化了。中国航天科工集团公司四部著名人物蒋春暄先生，自称是和闵考夫斯基等量的数学家。作为我国著名高校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培养出的学霸蒋春暄高工，从文革以来一直否定暗物质、暗能量、引力波、上帝粒子、夸克、弦论、量子纠缠、黑洞等科学。当2015年11月2日《学术圈日报》发表的《探秘6大物理学“僵尸”谜题》一文后，他借此也就口口声声说“暗物质是僵尸”。这类似把“伊斯兰国”争论现象引进到自然科学领域，这本来没有必。学术的争论，是讲科学道理，让大多数人明白，不是国际战争靠拉帮结派。

蒋春暄先生口口声声说论证暗物质、暗能量、引力波、上帝粒子、夸克、弦论、量子纠缠、黑洞等存在的人，是“胡说八道”；而他国外有 email 人物支持，他们不是白痴，他们能理解他的没有暗物质的新引力公式。没有暗物质，全世界就会自动取消暗物质实验。但靠这种 email 对付全世界的暗物质实验，能是科学实验主要人物？如果我们反过来说他完成的桑蒂利 iso 数论，也是僵尸数学，蒋春暄先生不是也说：“不要胡说八道，iso 数论不是僵尸数学”。李世春教授说：中国古代数学发展不下去的一个原因，是符号选择的不好，筹算方法就是一个例子。祖冲之用筹算符号计算出了 $\pi = 3.1415926$ ，这说明筹算符号是一种可以用来研究科学的符号，但是筹算符号本身没有多少科学含量，否则就不会被淘汰。由此可见，并不是每一个科学模型都包含着科学。 $3 \times 3 \times 3$ 魔方流行的时候，国外的学者都用方位符号来表达魔方的小块，例如，U（上），D（下），L（左），R（右），F（前），B（后），通过组合这些字母，可以描述所有3阶魔方的26个小块。而他引出的数学符号的内涵与美，是用笛卡尔坐标系，笛卡尔坐标系也可以表示方位。但关于三阶魔方，还有很多问题没有真正从数学上解决，如三阶魔方的那些复位公式（操作序列）是如何弄出来的？别人使用U、D、L、R、F、B来表示魔方小块的方位和操作序列，但U、D、L、R、F、B不是数学意义上的符号，且这些符号没有（或难有）可运算性。

李世春教授理解把魔方能被搅乱的小块看作

“转座子”，它们能“离家”出走。不过离家出走的小块有多少个固定的地方？由于魔方的机械结构，使得小块和小块互相关联在一起。如果操作序列不受限制得话，找回了A，又跑了B。有可能找回（复位）一个，跑了多个。这就是魔方复位的难点。李世春教授说：搅乱魔方是破坏性的操作，任何人都有能力善于搞这种破坏性工作。把搅乱了的魔方复位，就是搞建设性的工作。“搅乱魔方的实践表明：善于破坏旧世界的人，未必善于建设新世界”。把这话拿来对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的旗帜“合作共赢”， $P = NP$ 还是 $P \neq NP$ ，“始终不变是中国问题一直很复杂”。

例如联系房宁教授的《民主与发展——亚洲工业化时代的民主政治研究》一书中，有提类似说法、想法和做法的提法；联系实际，实际还包裹着效果，而且该书还说在亚洲调研，发现在新的科学环境中，说法、想法、做法和效果也在产生“合法性”的新变化。用“不比功劳比智慧”概括，也有深刻和有时代性。比“智慧”，是一事一议。新中国研究“物质无限可分”，是毛主席首先提出来的。那么毛主席的这个智慧是从哪里来的？如果物质无限可分，可分一分为二，分为显物质和暗物质，两者类似自然数、实数与虚数，间隔内外的无限可分又是不可分的，这种数学线性中的非线性，这种说法、想法、做法和效果，产生“合法性”的新变化，“不比功劳比智慧”的概括，毛主席终生没有表露，从毛主席到邓小平同志的这种韬光隐晦的智慧，又是从哪里来的？对比蒋春暄先生，倒不会“声东击西”。

蒋春暄先生我们解释说：“ $z = x + jy$ ，我只研究 z 。式中， x 和（或） y 表示时空； j 为 $j^2 = 1$ ，和 $i^2 = -1$ 一样是算子”。我们说：“ $j^2 = 1$ 和 $i^2 = -1$ 的算子本质不一样， $i^2 = -1$ ，是科学发现的前进，在实数的基础上承认存在虚数。而 $j^2 = 1$ ，只承认有正实数和负实数，是拉历史的倒车。没有虚数，你的超光速自然永远是实数”。

所以在《蒋春暄的博客》中，他发表的《“蒋春暄时空图”是划时代的》一文，在回答网友关于“蒋春暄不是学习物理的，为什么他国内外物理杂志发表超光速、引力、宇宙膨胀等论文”的问题时，蒋春暄先生说：“利用光速为常数，用算子 j 把空间和时间联起来变成一个数，作出‘蒋春暄时空图’，写的《亚光速和超光速映射理论》……在中国第一次把超光速粒子命名为‘快子’，亚光速粒子命名为‘慢子’。它比闵考夫斯基时空图更好描述空间是和时间特性”。众所周知，1953年毛主席就宣传“物质无限可分”，指明联系的是远古先秦经典《庄子》里说的：“一尺之捶，日取其半，万世不竭。”这类似古希腊学者芝诺为支持他的老师巴门尼德，设

计的几个强有力的运动与界面的悖论，如希腊神话中的飞毛腿阿基里斯追不上龟等参加的辩论。所以中国第一次的空时图联系“物质无限可分”，是类似“芝诺坐标”。

芝诺坐标的起源，是之前希腊人认为点是位置的单元，所以由有限点组成的任何长度都可以通约，也就是可以找到某个最小的长度基元。巴门尼德与芝诺等人担忧：如果认为点没有大小，又为何可以认为长度是由有限个点组成的呢？数学作为一门精确科学，这种把时空作为点的堆集的这种关于宇宙和谐性的空间基础研究，会出现的危机。例如人追龟，是指人与乌龟接触的那一刻，因此只要人与乌龟之间的差距小于乌龟或人体的尺寸，这就是一个界面。小于这个尺寸，不能把赛跑的龟分了还看成龟，也不能把赛跑的人分了还看成人。即在小于这个界面内，既不能藏下一只龟，也不能藏下一个人，除非有往点内穿的本领。这是一个跨界问题。如果承认有这种跨界，就是承认有芝诺悖论反驳的一面：物质世界是整体式的，现实是一个没有变化的统一体。但宏观世界的真实情况不是这样，即没有超界的高能，真空是不易撕裂的。在小于乌龟或人体的尺寸下，乌龟或人的身体总有一部分要露在这个界面外，因此人与龟的身体必然会接触，即人能追上龟，芝诺悖论不成立。

因此要说明众多对芝诺悖论的解答不完备，需要建立芝诺坐标系。例如用 X 轴代表物质与真空，用 Y 轴代表思维与存在，作成平面直角坐标系，定交点为 O，箭头一边为正，另一边为负。正的表示不需要意会理解的思维与存在、物质与真空，负的需要意会理解的思维与存在、物质与真空。如此构成的坐标系把万事万物分成了四个象限。

第 I 象限属于自然界、宇宙以及人类社会不需要意会理解的事物，包括爱因斯坦的相对论真空。

第 II 象限描述了镜像、梦幻一类的反映，以及部分的大脑贮存、书画贮存、音像贮存，电脑中的虚拟生存。镜像、梦境似乎可视可听，是不需要意会理解的思维与存在，但它们显现的空间是虚的、模糊的，是一些需要意会理解的物质与真空。

第 III 象限的东西，不论思维与存在还是物质与真空，都需要用意会才能理解。如无穷小量，类似于将小数散布到整数之间，只要你能想象着写出来，它就始终比零大，而比一个任意数小。无穷小量事实上的确存在并不是直接表明的，这种研究在数学上表现为内部集合论、模糊数轴论现象。而且产生了物理学上的弦论，即物质分到 10^{-35} 米的线度，粒子并不是一个无维的点，而是一条长度不大于 10^{-35} 米的细线或微小圈。

第 IV 象限的真空场及真空效应，不同于第 I 象限的相对论真空，而具有量子论的特色，即真空空

间并不是完全空的，它充满着小的量子起伏。这些起伏可以看成是波，即是物理场内的波动。这些波具有所有的可能的波长并且在所有方向上运动。我们不能检测出这些波，因为它们只是短暂地存在并且是很微小。这种真空效应是实在的，但也是需要意会才能理解的思维与存在。

上面就是芝诺坐标系。运动在它的四个象限内是不平权的，即存在反常和宇称的不同。芝诺坐标系存不存在？它与现实有没有联系呢？可以说，有许多热点、难点的科学、哲学争论，都间接与此有联系。例如，用芝诺坐标系考察蒋春暄先生导出的“蒋春暄空时图”用的坐标系，在《“蒋春暄空时图”是划时代的》一文中，蒋春暄先生说：1908 年闵考夫斯基发表的“空间和时间”演讲，把空间和时间统一起来用图具体实现的研究，它分为类时区和类空区，受到爱因斯坦赞同，称为“闵考夫斯基空时图”。闵考夫斯基、洛伦兹、爱因斯坦把空间和时间统一起来研究，奠定了相对论的基础。蒋春暄先生介绍到这里说：“闵考夫斯基和蒋春暄都是数学家，而不是物理学家。他们得出结果对物理研究起很大作用，说明数学研究对物理学起决定性作用”。但这里蒋春暄先生“偷梁换柱”，因为蒋春暄和闵考夫斯基两位数学家有本质的不同，闵考夫斯基的空间和时间统一，是真实存在的，是所有正常的人都可以理解的，属于芝诺坐标系第 I 象限的事情。

然而蒋春暄在该文说到他也是利用闵考夫斯基用图的具体方法，在研究空间和时间，但蒋春暄换成的是他提出他“快子和慢子共存原理”，强调的是“慢子可转变为快子，快子也可转变为慢子。快子无静止时间，无静止质量，快子是不可测量的粒子，没有因果律。整个宇宙是由快子和慢子构成的”。这只是蒋春暄的猜想，没有事实根据。和闵考夫斯基用图的具体方法差别十万八千里。因为闵考夫斯基的空时图放在芝诺坐标系第 I 象限，是没有蒋春暄的“快子和慢子共存原理”之说的；蒋春暄的“快子”在芝诺坐标系第 I 象限，纯粹是子虚乌有。因为闵考夫斯基、洛伦兹、爱因斯坦的“快子”是虚数，是属于第 IV 象限的真空场及真空效应。但蒋春暄却大言不讳地说：从“蒋春暄空时图”也可推导出超光速所有的结果，“这是人类第一次对超光速研究结果”。而且他 1976 年证明快子转动时产生向心力即引力，找到新引力公式；从这公式可以推导出牛顿万有引力公式，引力传播是超距作用，爱因斯坦说引力是光速传播是错误的。蒋春暄还说他 2001 年在美国发表的《强力和引力统一公式》，完成强力和引力统一问题，并计算出中子和质子半径 $R=1.55 \times 10^{-15}$ 厘米；电磁力和引力有相同公式，它们也是快子在起作用。这是蒋春暄先生在

说神话。

蒋春暄先生导出的实数“快子”，实际只是存在他的头脑中，属于芝诺坐标系第Ⅱ象限描述的对象，他却蛮不讲理拿到芝诺坐标系的第Ⅰ象限，充当实验可以理解的实物，其实这种“蒋春暄空时图”已经不适用于量子理论。蒋春暄先生虽然用数学分析得出快子和慢子共存，但他把快子和慢子共存运动在四个象限中的芝诺坐标界面舍去了，从而得出第Ⅰ象限中的“慢子”与其它象限中的“快子”混同在芝诺坐标系的第Ⅰ象限，这是我们反对的。当然蒋春暄先生也正确地指出：“快子转动时产生的离心力是引力”。因为如果“快子”是虚数，类似在“点内空间”是相反的。

暗物质追踪六十年从何说起

我们把毛主席看作中国现代科学之父，而且把暗物质追踪60年是从1955年算起的。因为如果物质无限可分是中国暗物质研究的起源，那么从马恩原旨原味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范畴，引进到具体科学实践、实验的研究，是新中国成立后，毛主席在已经提出讨论古代物质无限可分话题的基础上，1955年又拿到他亲自召开的研究我国原子能科学发展会议上，大张旗鼓去引导类似暗物质研究。在这次会上，毛主席对出席的钱三强教授等中国科学家们说：“质子、中子是由什么组成的……质子、中子、电子还应该是可分的”。这里没有说出潜台词，也许就包含在“质子中子纳须弥于芥子”，可比拟暗物质了。毛主席曾经想当科学家，但中国革命需要他去解决更现实的大问题，在我国第一流的科学家们面前，他不会班门弄斧。

暗物质如果跟质子、中子有关，就有量子力学问题。钱三强不说普朗克的量子论，普朗克尺度的量子是不可能再分小的，但毛主席也不能不知道。但物质无限可分如果指向暗物质，我国科学家们能理解他各类的说法、想法、做法和效果，和产生的“合法性”新变化，以及“不比功劳比智慧”的话，是最自然最好的结局。毛主席是相信人民相信党的伟大领袖，他硬是坚持到文革后今天的好结果。为啥？

肖恩·卡罗尔说：一千个哲学家思考了一千年所想出来的东西，也没有量子力学那么奇怪。杨振宁曾回忆说：1973年和毛主席见面，毛主席说他年轻的时候，也希望在科学上能够有所贡献。李政道说1974年和毛主席见面时，毛主席想了解的第一件事情，竟是物理学中的对称性。李政道还说第一次见到邓小平同志，是在“文革”的1974年，第二次是1979年在美国。以后十多年每年回国，几乎都见到他。邓小平同志关心祖国科学和教育事业的发展，1984年在人民大会堂见到邓小平，正是小平先生的亲自过问，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才成为世

界上少有的完全达到原设计要求的实验设施，“没有小平先生，就不会有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土性和地域性的基础是什么？这也许很早就影响毛泽东一生的人生轨迹。毛主席作为湖南韶山冲的一名农家子弟，冲入中国政治舞台，他的物质无限可分联系科学中国梦的兴趣，最早起源何时何地？1918年8月19日，25岁的毛泽东为组织湖南青年赴法国勤工俭学，第一次来到北京。1918年9月底，毛泽东经北大杨怀中教授的介绍，到李大钊任主任的北京大学图书馆当助理员，负责报纸阅览室15种中外文报纸的管理。在这里能查阅到中国更多的古籍，为青年毛泽东提供了一个造福人类，接触从自然科学统一方面放飞新思想的广阔天地。例如，在北大的短暂6个月，毛泽东每天通过管理和阅读报刊，听来来去去的北大师生们议论各种热点新闻，他第一次听到脑洞大开的爱因斯坦的名字。爱因斯坦对世界有何冲击力？早在这的1907年至1915年间，爱因斯坦建立的广义相对论，他根据相对论得出推论：宇宙是有限封闭的；宇宙的形状取决于宇宙质量的多少。按爱因斯坦此说，宇宙中物质的平均密度会达到每立方厘米 5×10^{-30} 克。即使今天观测，宇宙的密度也比这个值小100倍。“失踪”的物质今天就叫“暗物质”，当然那时还不知道有暗物质，也还没有原子弹的核爆炸。但1917年3月25日爱因斯坦在普鲁士科学院作“引力的场方程”的学术报告，预言质量会影响时空的流动，11月发表的“用广义相对论解释水星近日点运动”，到1918年还是影响到北京大学的学术圈。

特别是1917年12月6日，加拿大西部海港城市哈利法克斯的灭顶之灾，因两船相撞引起的大爆炸，和爱因斯坦广义相对论的神秘物质时空流动联系起来，学术圈对化学反应也产生过敬畏和怀疑。大爆炸是1917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接近尾声，“伊莫号”的挪威籍货船驶进哈利法克斯海峡，这时对面有一艘船名叫“勃朗峰号”的货船，前舱装着易燃性化学制品，中舱还装着十桶汽油，后舱是3000余吨梯恩梯炸药的军火运输船，从相反方向缓慢靠近走到了同一条航线。船有惯性，加之有海流等多种因素影响，“伊莫号”撞进“勃朗峰号”体内，恰巧是中舱装汽油的地方，汽油溢出流进装有化学制品和火药的船舱，很快就引起熊熊大火。17分钟后巨大的爆炸，哈利法克斯的一半几乎都被夷为平地，房屋、人、牲畜、车辆、杂物等在猛烈的爆炸中被气浪抛向天空。有100多年历史的省府大楼、雕梁画栋的大戏院、庄严肃穆的古老教堂等，一座座精美的古典建筑都毁于一旦。爆炸夺去了2300多人的生命，9000多人受伤或终身致残。包括城市居民、士兵、海员、消防员、警察、工人和政府官

员。灾后重建经过了漫长的 25 年，后来建筑大都是爆炸之后重建的。

毛泽东在第二次到北京时，又听到 1919 年 9 月英国天文学家观察日食的结果，证明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是经得起考验的科学理论；11 月 6 日消息公布后，全世界为之轰动。虽然这类科学信息对当时中国绝大多数人，不过是身外之物，但对毛泽东的影响还有另外的原因，其中就有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毛主席的岳父杨开慧的父亲杨怀中先生（1879-1922，原名杨昌济）。他把能公开的伦理学教学，暗中与马克思主义的和谐大国关系结合做研究，希望中国避免陷入“鸦片战争”的老路。因为杨怀中先生学习马克思 1858 年在《鸦片贸易史》中的讲话：“一个人口几乎占人类三分之一的幅员广大的帝国，不顾时势，仍然安于现状，由于被强力排斥于世界联系的体系之外而孤立无依，因此竭力以天朝尽善尽美的幻想来欺骗自己，这样一个帝国，终于要在这样一场殊死的决斗中死去”。

在毛泽东主席出生前，中国虽然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但从 1888 年也称作光绪十四年，可以说是濒临死亡的满清王朝，经过战乱不断，国家体系崩溃，经济跌至谷底；外敌不远千里驾驶着军舰到中国肆意蹂躏，民生不聊，这时在中国历史上做了最后一次挣扎：一是广东才子康有为，第一次上书光绪帝，吁请“变成法，通下情，慎左右”。当时整个清朝朝廷，正是洋务派当道的时候，慈禧还给光绪有足够的空间去实现自己的理想。这一年在中国也是现代货币形式出现的开始：两广总督张之洞设立银元局，铸造银币；同时另一位洋务运动的代表李鸿章，支持上海道龚照瑗及严信厚等，在上海筹办华新纺织新局，颇有现代工商体制的雏形。在教育方面，在天津，中国有了第一家中学天津汇文中学。在南京，建立了一所教会制的大学金陵大学。在军事上那年清政府批准《北洋海军章程》，北洋海军正式成军。这和 19 世纪 60 年代开始的“求强”、“求富”的洋务运动影响也有关：洋务运动的中心内容除办新式军备外，就是要办新式工业和学堂。全国类似 1873 年海南办的继昌隆缫丝厂、1881 年上海办的公和永丝厂、1881 年上海办的同文书局、1890 年办的上海机器织布局 and 湖北纺织四局等近代气息，一波又一波袭来，即使在祖国西南偏僻的盐亭这块有过远古文明洗礼的沉眠的小县、穷县，也开始抬起头来。

湖南的杨怀中、陈润霖和四川的张澜、何拔儒（1862-1955），是 1903 年留学日本弘文学院时的同学和朋友。杨怀中从何拔儒那里知道他研究中国的和谐国际关系，已追溯到巴蜀盆塞海山寨城邦文明和海洋文明的远古联合国。而何拔儒从杨怀那里，知道 1898 年戊戌变法前，谭嗣同、康有为、

杨深秀、宋伯鲁等维新派还具体研究过中国与英、美、日、俄等大国的关系，有过组建世界联合国的探讨热情。1898 年 9 月 28 日谭嗣同、杨深秀等六人被清朝斩首，而杨怀中先生就是赞同谭嗣同，1897 年就读岳麓书院时，就加入过南学会的革命派。1898 年戊戌变法失败后，他隐居乡间研究和諧大国关系之学，绝意仕途。同年儿子杨开智出生，1901 年又生下女儿杨开慧。家庭的变化，杨怀中用自己的薪俸维持一家人，正当他彷徨苦闷时，原先结交的革命党人、好朋友杨毓麟从日本写来信，要他东渡日本，去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在为世界大国寻找相处之道的感召下，他把杨昌济改名杨怀中，1903 年去日本留学。1906 年在弘文学院毕业后，他升入东京高等师范学校专修教育学。1909 年在杨毓麟、章士钊等好友的推荐下，清政府派往欧洲的留学生总督蒯光典，调杨怀中去英国深造，专攻哲学、伦理学和心理学。1912 年杨怀在在苏格兰的勒伯丁大学毕业，获文学士学位。随后往德国进行为期九个月的考察，还去过瑞士考察。

1913 年杨怀中回到阔别十年的祖国，早在 1911 年辛亥革命后，作为同盟会秘密元老的陈润霖，受黄兴之命，借助他自己的老关系、立宪派党人谭延闿当湖南都督，让他当上湖南省教育司长的机会，就在长沙创建省立第四师范学校想培养和网罗年青的革命党人。陈润霖还借谭延闿声援四川“保路”运动的口实，建议邀请张澜、吴玉章、蒙公甫、何拔儒等被追查的“保路”运动达人，到湖南任教。谭延闿知道黄兴、杨怀中、张澜、何拔儒，是陈润霖留学弘文学院时的同学和朋友。但最能来的是何拔儒，当时是成都川北中学校长和四川师范大学学监，资历够。不顺的是陈润霖展开第一师范学校新校舍动工修建时，就被挤下了台。1913 年谭延闿宣布湖南独立，黄兴通过谭延闿再次奉派陈润霖创建省立第四师范学校。杨怀中推荐陈润霖当湖南省教育司长，并还推荐聘请何拔儒到省立第四师范学校任教。于是陈润霖走马上任，在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搬进新校舍后，开始在第一师范学校原旧校舍挂牌省立第四师范学校招收新生。1913 年杨怀中从欧洲留学回长沙时，还带回大量自然科学方面的资料，希望何拔儒能到长沙与他继续共同研究，这也是何拔儒乐意接受陈润霖相邀的另一个原因。正是 1913-1917 年杨怀中与何拔儒共同在一起教书的日子里，结合《黄帝内经》的研究中得出两条科学原理，这类似古中医科学的“藏象论原理”和“标识无关性原理”，他们自己称为或对“科学”的“杨-何定义”。

其实，早在日本留学时杨怀联系现代人类的婚姻，解读伦理学和心理学结合，他把“标识无关性”就讲得让何拔儒着迷：远古盆塞海文明的失

落，是来自自然灾变，这是一种恐惧。人类早期婚姻是处于一种相同血缘的自交，但这样下去出生的人，健康会越来越灾多难，这给人们心理也是一种恐惧。然而人们发现婚姻如果是不相同血缘的杂交，却健康得多。不同血缘婚姻结合，在姓氏上中国人的“标识无关性”体现最明白。因此没有恐惧，就没有伦理学，也没有心理学。文化的交流、经济的交流也是如此。但杨怀中先生等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的马克思主义和谐大国关系研究，没想到由于清末的铁路风潮与革命的最终爆发，1911年在四川发生各阶层人民的保路风潮，除南充、荣县等地区外，盐亭也是最为活跃的地方。

1911年5月张澜以南充代表出席并当选为川汉铁路股东大会副会长，大会成立了保路同志会。四川的保路风潮的骨干成员主要是留日学生，在这场革命风暴中基本上充当了领导者的重要角色，对运动的成功起着决定作用。特别是盐亭人中已经有一批研究马克思主义和国际共产党的专家，而且有留过学的，如范仲纯、何拔儒、张维川、范蜀林等，而且范蜀林的哥哥范仲纯1906年在日本留学时，学的专业就是早稻田大学的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方向就是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范仲纯和范蜀林兄弟俩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传播，对保路风潮起到了关键的理论指导作用。

范仲纯（1884-1964）和范蜀林（1893-1949）兄弟，盐亭石牛庙乡人。其父范炳南，清末科举秀才，一生不涉仕，在家穷研经史，但只用来对中国传承的“抗争文化”作推演研究。范仲纯先受父亲范炳南的影响，东渡日本想再了解外国的“抗争文化”。之前范仲纯已经读到过日本贺长雄的《近世政治史》的中译文，以及幸德秋水著的《二十世纪之怪物帝国主义》，知道西方学者谓之的社会主义和赞扬马克思的知识。范仲纯1910年底学成归国后，开始在自家私塾和盐亭县里新潮人士家庭朋友聚会中，讲解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好东西。而正是1911年四川保路运动遭到四川总督赵尔丰的镇压，张澜、蒙公甫等多人被囚于成都府监狱，全国震惊。

凶讯传到湖南，引起东京弘文学院老同学陈霖霖的关心，陈霖霖给何拔儒写信，询问学友张澜和他的情况，并有心谋划邀请他们到湖南教书。当时以“民主”和“科学”为时尚的新文化运动，在长沙比四川开展得好，何拔儒也有心想到湖南增长才干，这是他去长沙教书的原因之一。众所周知，毛泽东（1893-1976）在长沙第四和第一师范学校读书的简历是：1911年春到长沙，考入湘乡驻省中学读书；同年12月底响应辛亥革命，到湖南新军当列兵，到1912年5月退出当兵。1913年春考入湖南省立第四师范学校预科读书，1914年秋编入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本科第八班，1918年6月在湖南省

立第一师范学校毕业。同年8月到北京，得到杨怀中、李大钊等的帮助，担任北大图书馆管理员。毛泽东1913年春考入湖南四师，当时陈霖霖任校长，没有正式校舍，只租用一栋民房艰难办学。

1914年春，湖南四师又招收了一批学生，校舍更为紧张，毛泽东协助陈霖霖四处联系，但终未解决。后湖南省议会决议将湖南四师全部合并到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陈霖霖被免去校长职务，重回自己创办的楚怡学校。所以杨怀中从1913年回国先后任教湖南省立高等师范学校、第四师范、第一师范、商专、一中等校。1918年应蔡元培先生之聘，任北京大学伦理学教授。他为赴法勤工俭学学生筹措经费，推荐毛泽东到北大图书馆工作，促成了爱女杨开慧与毛泽东的婚恋关系。何拔儒是受张澜建议，带有协助四川革命团体了解湖广等南方各省革命团体动态的任务，1913年来长沙接受陈霖霖的聘请，留在第四师范、第一师范教书的。何拔儒在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后离开长沙，也是张澜决定的。有人说，是陈霖霖校长识才，首先把毛泽东招进长沙第四师范。而何拔儒也是通过陈霖霖才认识了毛泽东。

对于何拔儒认识毛泽东，以及他和毛泽东有可交流的语言，是毛泽东幼年两岁到八岁寄放在他母亲娘家，即外婆文家里长大的。毛泽东的舅父中有教书的；他的大姨婆家即王家，表兄中也有教书和留过学的，在第四师范教师中就有这样的表兄。何拔儒常常借这些话题与毛泽东交谈，使他们之间更加密切。而在新文化运动中，毛泽东的敢作敢为也让何拔儒喜欢上了他。何拔儒1955年93岁病逝，建国初被聘为四川省文史馆文史研究员，但对“远古联合国及四川盆塞海地理形成”的学术思考不愿留下文字，更不愿公开进行文字争论。不是何拔儒看走了眼，这以后的时间才能明白的，何拔儒是属于毛泽东岳父杨怀中的那一种人：研究经世之学，暗中也在探讨了解“东洋”和“西洋”的国家形态以及马克思、列宁的阶级斗争文化，都在为重视家乡建设。何拔儒和杨怀中以在日本弘文学院，以及杨怀中从欧洲留学回来，他们一起在长沙第四师范、第一师范教书时，这都是他们经常私下讨论的问题。

原因是，何拔儒在日本时，告诉杨怀中，他家盐亭县有盘古和嫫祖出生的传说，还让他的探索产生了有人类远古联合国的猜想。以此也能解答世界大同走和平崛起的多元一体的形态，而不是走国家、民族以各自的利益纷争的世界分裂的多元伦理道路，这使杨怀中找到找到了知音。杨怀中极为秘密地告诉何拔儒，1897年他就读于岳麓书院时参加谭嗣同派的南学会，就听说谭嗣同赞同以中国为首，联合美国、英国、日本组成以人民自决的多元

一体的国家形态，但谭嗣同等人遭到慈禧太后的追杀。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后，他专攻哲学、伦理学、心理学和教育的经世之学，也是为了解决和平崛起的多元一体的问题，但没有从人类远古史提供的资料来研究。正是受杨怀中和何拔儒这样的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人文与科学兼备的老师的言传身教，毛泽东从湖南农村走出，他在北大图书馆能被吸引不时注意到，西方自然科学的新奇发展，与中国古代文献中的物质可分科学有不同寻常的同工异曲之妙。由此，毛泽东在当时和后来能想到中国古代文献中的物质无限可分科学，实际也曾是他想尝试开辟物理前沿科学的统一之梦。所以新中国解放不久，毛主席从对物质无限可分的兴趣，很快升华到重视原子弹、氢弹的科学实验和制造，和1958年大跃进开始大张旗鼓宣传向科学进军，这不是偶然的。

60多年我们能理解物质无限可分与暗物质的联系也不是偶然，这正是多亏毛泽东主席宣传物质无限可分的指引。早从1953年起，毛主席与身边做保健医生说物质是由更小的成分构成的观念时提出：“墨子在公元前5世纪就提出‘端’是组成物质的最小成分，比外国人提得早”；还说“一尺之捶，日取其半，万世不竭”自《庄子》开始的。从1955年毛主席把物质结构“质子、中子、电子还应该是可分的”的问题，提交给钱三强教授等中国科学家，其潜台词包含“质子中子纳须弥于芥子”可拟暗物质，到2015年12月探索暗物的中国锦屏山地下实验室二期工程土建工作完工，历时10年建设的锦屏水电站全面投产，这里不仅成为探测暗物质的主战场，而且更多深地科学领域实验项目，已在开展。同时由中国科学院研制的暗物质粒子探测卫星，已将于2015年12月中旬发射升空。这颗暗物质粒子探测卫星，作为我国空间科学卫星系列的首发星，与其运载火箭长征二号丁，11月已在上海装载完毕乘专列运到了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毛主席1937年在《实践论》中说：“你要知道梨子的滋味，你就得变革梨子，亲口吃一吃”。但爱说梨子酸的人，并不是真吃过梨子。

2015年11月2日《学术圈日报》发表的《探秘6大物理学“僵尸”谜题》一文，之所以说暗物质是“僵尸”，其僵尸No.2：季节性出现的暗物质“幽灵”一项中讲：“诡异的是，在检测了宇宙中85%的物质后，科学家们任然无法确定暗物质的确切来源”。20世纪90年代末，意大利研究人员在格兰萨索地区发现带有明显季节性迹象的暗物质与碘化钠晶体的作用产物，从而推测地球绕太阳公转的速度可能与暗物质有关。在这之后的所有研究，都没有证实类似的结果，但也没有证据能够证明该研究结果有误。目前，南半球已经有两个正在

建设的新观测点（分别在南极和澳大利亚），科学家们希望能够在拥有相反的季节变化的地方找到新的证据。

此条的说辞，并不符合其文自己对“僵尸”的定义。也说明该文的作者并不是一个真正干自然科学研究的人。该文对“僵尸”科学的界定是：当一个全新的科学研究成果问世时，研究人员往往会通过实验验证它的真实性。但世上还存在一些永远处在尴尬的灰色地带的研究成果，它们似乎永远无法被证明是真，也无法被宣布是假，像不死的僵尸一样困扰着研究人员。季节性出现的暗物质“幽灵”，“季节性”本身就指星球的公转和自转运动。季节性”的重复性，和发生暗物质源的天体的重复性，本身也不一定是同步的，没有证实类似的结果也就不奇怪。况且科学家们还在希望能够拥有相反的季节变化的地方，找证据，何来“僵尸”之说。以此看暗物质，是“永远处在尴尬的灰色地带的研究成果”吗？所以这只能算一家之言。

奇怪的是蒋春暄先生说：当代许多物理理论和实验结果都是错误的，杨振宁、李政道、周光召、路甬祥、白春礼，多次讲话写文章要中国重视21世纪最大问题暗物质和暗能量的研究。目前全世界大力气探测暗物质，中国对僵尸物理学也非常重视。科学家假设暗物质提供引力，但暗物质是不可见的；暗物质是什么？也不清楚，所以全世界科学家大力探测暗物质，这次中国年底发射暗物质卫星就是紧跟国外，这是最大错误。中国暗物质卫星应称“僵尸卫星”。暗物质、暗能量、黑洞、弦论等都是僵尸物理学。在地上不能发现暗物质，在天上更不能发现暗物质。丁肇中在天上阿尔法磁谱仪没发现暗物质，中国首颗暗物质卫星也不会发现暗物质。上天入地几十年至今仍一无所获，因为暗物质根本不存在。这里蒋春暄先生也知道科学家假设的暗物质，是提供引力，这正是几十年中都有实验证实的。暗物质是什么不清楚，所以要探测暗物质这何罪之有？这不正是一种老老实实的科学态度吗？

但蒋春暄先生口口声声说别人是“蛮不讲理”、“胡说八道”，难道蒋春暄先生不正是自己“蛮不讲理”、“胡说八道”吗？中国出了什么问题？蒋春暄先生自己很清楚，他在《“蒋春暄空时图”是划时代的》一文中说：“在文化大革命中，大家都在宣传毛泽东思想，根据对立统一规律，在正必有负，反之也行，我写一文《用毛泽东思想创立一门新型数学》，到处张贴、结识一些数学爱好者。他们对我帮助很大，这就是我后来证明费马大定理的数学基础。本文1968年发表在清华大学井冈山小报上。当代最著名理论物理学家吴咏时（他现在美国）来信，你这种数学可以表示相对论中空间和时

间”。“在文化大革命中，中科院权威被打倒，学术自由才有创新，1975年他才能在中科院《物理》杂志上，从基本空时图发表《亚光速和超光速共存原理》，提出国外认为超光速粒子是虚质量，这是错误的”。

我们要说：这里蒋春暄先生终于自爆他对超光速只承认实数，是源于文化大革命动乱思潮。因为毛泽东思想不是蒋春暄先生说的“在正必有负，反之也行”。至于蒋春暄先生说的1975年他在《物理》杂志上发表实数超光速论时，就遭到很多人反对，最后是中科院用两人争鸣的文章同时发表，他的划时代论文才发表。如果在今天，中科院对他的文章根本不能发表。这里蒋春暄先生说对了，在文革中坚持原则的人，中科院也有，但那时“四人帮”还没有被揪出，两人对立争鸣，正是等待用时间来检验物理学“僵尸”的办法。文革后证明谁是“僵尸”，不是已自明了吗？

蒋春暄先生说，1976年他的新引力公式发表在《北京天文台台刊》上。利用新引力公式，他2004年提出《宇宙膨胀理论》，否是暗能量。其方法是：

(1) 引力是什么？它如何工作？找到新引力公式，彻底地否定暗物质；(2) 宇宙为什么会膨胀？找到膨胀原因和膨胀加速度公式，彻底地否定暗能量。由于当代物理学家没有考虑他的占宇宙1/2超光速物质，是宇宙形成的主要物质。实验找不到暗物质，又没说是假，所以他称僵尸，但他的iso数学不是这样。搞自然科学是老实态度，暗物质追踪60年，对比中国60年间经风雨见世面的暗物质探索，收网蒋春暄先生的新引力公式和iso数学的不同观点，称其新引力公式和iso数学是“僵尸”谜题，也不是“胡说八道”。中国教育学会《中小学数学*初中版》2008年第12期，发表蒋春暄先生的《改变现代数学的桑蒂利ISO数学理论》一文，说“现代数学是ISO数学一个特例”，如果还有一点道理的话，现代数学与iso数学到底是一个什么的关系呢？

我们把iso数学和“点内空间”数学，类比“倒车镜”，这如玻尔兹曼的“原子力学”，先被质疑无实验验证没有道理，其实实验验证已在“倒车镜”之外先验的存在。宇宙大爆炸理论、超弦/超膜理论、圈量子引力理论、超对称理论、全息理论、暗物质、暗能量、引力波、上帝粒子、夸克、量子纠缠、黑洞等理论的突破、建树、延拓，并没有离开是实验实践的步步深入。今天欧洲核子研究中心(CERN)的大型强子对撞机(LHC)，就是它们的一处标志性仪器的创制。CERN的超质子同步加速器，早在1983年就发现了传递弱相互作用的中间玻色子W和Z，这便证实了弱-电统一理论；美国费米实验室的大电子伏质子-反质子对撞机，于1995年发现第

六种最重的顶夸克(t)，由此扩充了夸克模型，并确认物质的“基底”粒子层次夸克-轻子共有三“代”。但桑蒂利的强子力学，强调实验验证，后来扩展到强子化学、强子数学、强子生物等领域，也都强调实在，但也只是流于形式，时间证明已成为“僵尸”谜题，连回到爱因斯坦等人要求的威严肃明的实在性立场，都没有一点影子。

因为桑蒂利质疑夸克与其它初级粒子---相对论和量子论延拓出的“原子力学”或量子色动力学等理论，主要是说因它们是数学构成的对象，无实验验证，并非和中子具有同样意义的真实性。而他桑蒂利的来自iso-电子与iso-质子基础上的强子物理学所建立的理论，却能够克服这些猜想。当这只是桑蒂利的说法、想法和简单的做法，花了大量的科研经费，却没有见到传世的效果，成为一种无法证实的误导。

超光速粒子不涉及虚数吗？新引力公式和iso数学都是实数时空的线性方程，不涉及非线性方程吗？iso-数学不是涉及“-1”吗？弦论研究，发展到D-膜或Dp-膜，出现了一种新的数数p，这是从-1开始：-1, 0, 1, 2, 3, 4, 5, 6, 7, 8.....。这里的“-1”既是负整数范畴，也可是象征正虚数和负虚数，类似一种“倒车镜”。此时我们称它为反D膜或“点内空间”。相对论和量子论延拓出D-膜数列p，从-1开始，-1, 0, 1, 2, 3, 4, 5, 6, 7, 8.....，它包含了“点内空间”，类似现代前沿科学装上了“倒车镜”。弦论的数学方程类似“倒车镜”，已解决了实验验证---弦论的前方，不说了；说了，前方可能存在更多不同的宇宙和高维空间等太多无法证实的观点。其实从四维时空以上，高维空间都是在“点内空间”；即使类似有人说：那只是研究者个人预测的虚像。在倒车镜中找虚像，确实永远无法证实；但倒车镜展出的映像，却有实在的---弦论盯着“倒车镜”。如果iso-数学不是“僵尸”，盯着iso-数映射的是“后方”的“景物”---凭据这些“后方”的“景物”，是虚是实，一是可用实验检验，二是也可知道这条“公路”的情况和车前进到的地点，这一点也不含糊。同样暗物质的探索也一点不含糊。

暗物质对决桑 ISO 数学僵尸

众所周知，暗物质在宇宙中是一种颇有个性化的粒子，它品质很大。暗物质既不发光，也不吸收光线，但对恒星和星系的引力影响，为它的存在提供了强有力的间接证据。为直接寻找暗物质，科学家试图测量当暗物质“光晕”中的粒子，同地球上普通物质的原子相互作用时所发出的微小能量。不过，这种互动极其微弱，20多年的搜寻尚未发现令人信服的证据。说白了，人们只能通过引力产生的效应，得知宇宙中有大量暗物质的存在。而暗物质

存在的最早证据，也就是来源于对球状星系旋转速度的观测。现代天文学通过引力透镜、宇宙中大尺度结构形成、微波背景辐射等研究表明：原子、分子、等离子体等人类熟知的重子物质，只占宇宙总密度的 4% 或 5%，我们所认知的部分大概只占宇宙的 4%，宇宙密度的 95% 以上是尚不为人们所了解的暗物质，占了宇宙的 23%，还有 73% 是一种导致宇宙加速膨胀的暗能量。

由于最初的办法是天文观测法，却无法解答暗物质是什么，后来就采取间接探测和直接探测的办法。前者，是探测暗物质相互碰撞产生的普通物质粒子信号，一般通过地面或太空望远镜探测；后者，则是用原子核与暗物质碰撞，探测碰撞产生的信号。在地面上，因为宇宙射线众多，这些信号会对直接探测产生干扰，影响其鉴别能力。因此，地下实验室的建成可帮助探测器挡去干扰。现在我们随《四川日报》记者刘川，采访走进的中国首个极深地下实验室锦屏地下实验室，听他介绍曾去过那里的情况。清华大学、上海交大两个实验组已入驻这里的地下实验室，两个实验组的探测方式并不相同，上海交大使用液氙探测器开展暗物质的直接探测，清华将采用低温半导体开展探测。在这个过程中，四川大学也与清华大学协作，加入暗物质研究课题。锦屏地下实验室呈“T”形结构，清华暗物质实验室是双层结构，科学家们在底下一层做研究，第二层放设备。最里面还有第三道门，里面藏的就是清华的暗物质探测仪器。这个门可是 1 米厚的聚乙烯材料，用于阻拦和吸引中子。20 厘米厚的铅层，用于屏蔽外部的伽马射线；20 厘米厚的含硼聚乙烯，用于吸收剩余的中子；10 厘米厚的高纯无氧铜，用于阻挡铅材料及外部其他材料中的伽马射线，这些屏蔽设备几乎屏蔽掉了能够想到的一切辐射源。在最里面的低温液氮环境中躺着的是直接探测暗物质的 1 公斤高纯度锗实验探测器。地下实验室的仪器运行稳定后，只需在地面上的办公室监控探测器运行即可，而地下实验室的所有数据也会传送至地面，因而，科研人员无需 24 小时守着探测器。

1990 年出生的杨丽桃，河北石家庄人，四川大学本科毕业后进入清华硕博连读，2012 年起陆续在锦屏地下实验室工作，他说：“在 5-10 年内想探测到暗物质会很难很难，我们做的是尽可能在实验上排除掉暗物质不可能存在的区域，在理论上进行不断地修正，为后来的研究者打好基础”。锦屏地下实验室主任、清华大学教授程建平说：锦屏地下实验室目前容纳了上海交大、清华两个实验组，分别使用液氙探测器开展暗物质的直接探测和采用低温半导体开展探测。清华大学暗物质灵敏度实验结果，2014 年 11 月发表的论文推翻了美国 CoGeNT

暗物质实验组近年来宣称“已经探测到暗物质存在区域”的结论；上海交大则发表了 Panda X 实验得到的首个物理结果。清华和上海交大都在准备更新换代探测设备，清华从 1 公斤高纯锗探测器向 10 公斤迈进，上海交大计划将 120 公斤的液态氙向 500 公斤级的探测器升级。参与研究的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副教授岳骞说，锦屏地下实验室不仅可以探测暗物质，还可以开展地下核天体物理实验、太阳中微子等重大基础性前沿课题。

再看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升空的暗物质粒子探测卫星，据暗物质卫星首席科学家、紫金山天文台研究员常进介绍，为探测研究暗物质性质，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高能物理所、近代物理所和国家空间科学中心，自 2011 年起合作在研发暗物质粒子探测卫星。该暗物质粒子卫星造价约 1 亿美元，能够通过高空间分辨宽能谱段观测高能电子和伽马射线寻找和研究暗物质粒子，同时将在宇宙射线起源和伽马射线天文学方面取得重大进展，是迄今为止观测能段范围最宽、能量分辨率最优的空间探测器，超过国际上所有同类探测器。根据中科院小卫星工程中心的设计，卫星轨道为太阳同步轨道，轨道高度 500 公里，三轴指向天顶，有效载荷质量 1410 公斤，整星质量 1850 公斤，载荷平台比达到了 3.2: 1，功耗约 400 瓦，每天的数据量约 12G 字节。探测器位于卫星中心，卫星的服务舱和一些单机设备均分布在载荷的周围，通过精巧的设计，减小了卫星体积只有 1.5 米×1.5 米×1.2 米，比一张办公桌大不了多少；但降低了重量，大幅节省了发射成本，体积虽小功能却非常强大，是首次尝试“科学探测载荷一体化”设计的暗物质探测卫星。

以上情况说明，暗物质探索不但不是“僵尸”，而是脚踏实地一步一步按科学方法在进展。相反，说蒋春暄先生新引力公式和 iso 数学是“僵尸”谜题，或者希望他的“僵尸”变“冬虫夏草”，不正是“蛮不讲理”、“胡说八道”。也许有要人说：“蒋春暄教授滴，实力还是强大滴”。不错，蒋春暄先生前半生走得很顺，勤学、聪明，自学英语和部分高等数学，就能看英文资料，能用英语写数学论文。但暗物质、暗能量、引力波、上帝粒子、夸克、弦论、量子纠缠、黑洞等的存在，因国外也有反对派，他受文革影响不改就只能跟着这一派跑，分不清暗物质、暗能量、引力波、上帝粒子、夸克、弦论、量子纠缠、黑洞等研究，中国人也还有知识产权的创新，而一味认为这也是跟西方跑。他还说：“不懂英文，就不要学数学？别人的前沿科技新书，我看不懂。我只知道自己一定是对的”。这种我行我素，也是爱国吗？当然，蒋春暄先生也是特勒肖—伽利略科学院 2009 年度金奖获得者。

据张涛先生介绍,2009年6月5日特勒肖—伽利略科学院颁奖仪式在伦敦郊区赛乐斯顿公园饭店古堡举行,该组织总裁戴维斯先生为蒋春暄颁奖。颁奖理由是表彰蒋春暄先生在数论方面的杰出贡献,有4项:开发了有助于解决数论领域知名基础性问题的新型数论工具;认为黎曼假设是错误的;对ISO数论做出了贡献;首先证明费马大定理。蒋春暄获奖之后,《光明日报》进行了报道,国内各大网站、个人博客也有转载。对此张涛先生说“30多年名不见经传,在数学领域潜心研究的民间数学家蒋春暄,名字一下为国人熟知”。张涛先生也许有点委屈了蒋春暄先生,实际蒋春暄先生的名声在上世纪80年代就很大。

1984年我们在太原参加首届全国思维科学专题讨论会,和甘肃政法学院杨明震教授住在一起。杨明震教授是教哲学的,1981年他在《甘肃社会科学》第2期发表《对“物质无限可分”说的几点认识》一文,认为“物质无限可分”说并不是辩证唯物主义哲学首先提出的,且随着自然科学的发展还必将获得新的发展,出现新的形式;又特别是现代自然科学的发展,在现代科学技术条件下寻找“自由夸克”的巨大困难,给“物质无限可分”这个哲学命题提出了新的挑战。

正是因受毛主席“物质无限可分说”的教导,我们从显物质和暗物质区分,用环量子自旋的面旋、线旋、体旋的符号动力学进行编码,在对夸克、胶子、电子等全部基本粒子作“量子避错编码”后,还剩下4/5的“量子冗余码”难以处理。我们与杨明震教授交流讨论时,向他请教能否作“暗物质”看待,而类似玻姆的“隐秩序”量子论?没等我们说完,杨明震教授就说我们的思维,有像北京蒋春暄的地方,但说我们的推导又是完全相反的。杨明震教授说:蒋春暄超光速是一种全域性只分正、负实数,是从左右不同方向来区分看得见与看不见,观点不承认有复数。

1968年蒋春暄露头角,在《清华大学井冈山》小报发表的《用毛泽东思想创立一门新型数学》影响很大,杨明震也许知道。我们知道的是1975年蒋春暄写的《亚光速和超光速映射理论》在中科院《物理》杂志第4期发表,和1976年2月第四集重庆大学内部交流的《新物理探讨》刊物,发表他的《超光速粒子的因果律的探讨》论文。当时我们是在重庆工作,知道“北京142信箱”有个蒋春暄,宣传从左右不同方向分区观察超光速,问是不是一个蒋春暄?杨明震教授说,就都是北京的那个蒋春暄。高守研先生认为:文革“以苏解马”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充其量只是看到了马克思主义的表象。而我们认为,这也冲击到毛主席对“物质无限可分说”一分为二的教导。在毛主席生前,

当杨振宁、李政道在文革中回国时,毛主席之所以要热情接待他们,就是希望借助他们让“物质无限可分”说能走出“以苏解马”的误区。现在杨振宁、李政道、周光召、路甬祥、白春礼,多次讲话写文章,要中国重视21世纪最大问题暗物质和暗能量研究;再看目前全世界也在花大力气探测暗物质,中国紧跟国际科学主流走,这是正确的。这正说明毛主席的远见,“物质无限可分”联系暗物质,而不是蒋春暄先生说“中国对僵尸物理学非常重视”。

“物质无限可分”说追踪暗物质60年,国内各地各行各业学人主要是从哲学方面写文章。我们仅将收集到1979年到2011年的23篇文稿,按篇名、作者名、发表刊物名、年时间的次序,公布于下让大家分析,虽挂一漏万,也可见一斑:

- 1、物质无限可分性不是辩证法的观点,赵建文,《国内哲学动态》,1979。
- 2、“一尺之捶”无限可分吗?,石国强,《复旦学报》,1980。
- 3、评对“物质无限可分”的一种看法,王全志,《教学与研究》,1981。
- 4、对“物质无限可分”说的几点认识,杨明震,《甘肃社会科学》,1981。
- 5、怎样理解物质无限可分,谷守志,《教学与研究》,1982。
- 6、物质无限可分的相对性,周山,《黄石师院学报》,1983。
- 7、辩证唯物主义对物质无限可分性的论证,孙显元,《江淮论坛》,1985。
- 8、物质的可分性与受体分型,李殊响,张守诚,《医学与哲学》,1985。
- 9、物质无限可分论和现代“二难推论”对它的挑战,金吾伦,李曦,《社会科学辑刊》,1986。
- 10、对“物质无限可分论”的再认识,金吾伦,《物理与工程》,1987。
- 11、对“物质无限可分论”的再探讨,何祚庥,《自然辩证法研究》,1987。
- 12、物质结构层次无限论的再证实---与金吾伦同志商榷,查汝强,《自然辩证法研究》,1987。
- 13、论夸克禁闭和物质的无限可分性,张德荣,《盐城师范学院学报》,1987。
- 14、“物质无限可分论”是形而上学信念,不是辩证法---答何祚庥同志,金吾伦,《自然辩证法研究》,1988。
- 15、“物质无限可分论”之我见,刘文仲,《西北师大学报》,1988。
- 16、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粒子物理研究---夸克存在证据的寻找与物质世界的无限可分,洪文钧,《昭通师专学报》,1992。
- 17、关于“物质无限可分”的观点,晓点,《现代物理知识》,1993。
- 18、小议“物质无限可分”,刘宏茂,《现代物理知识》,1994。
- 19、微观客体的无限可分性及其自然科学依据,王士舫,《合肥工业大学学报》,1995。
- 20、物质无限可分的绝对性和相对性,孟德佩,《乡镇经济》,1996。
- 21、毛主席与物质无限可分说,王德奎,《博览群书》,2003。
- 22、“夸克幽禁”是对物质无限可分的挑战吗,梁保胜,武杰,《内蒙古农业大学学报》,2010。
- 23、信

息安全行业个性的“无限可分”，王一飞，《中国信息安全》，2011。

总之以上文章和还有的一些文章中，大多数认为那种把“由分子、原子、原子核、基本粒子、夸克……”这样“一直分割”，视为辩证唯物主义物质无限可分说全部内容的观点，是不妥当的。当然也有类似《应用技术网》等上的文章，似乎也在谈暗物质与显物质的具体处理，例如，张光阳，张福工，查民义，袁宏文，郭才陶等的《暗物质夸克、胶子制取装置》说：这种装置由高温高压水汽发生器和涡旋动量交换裂解器和夸克、胶子分离、冷凝器构成，实现让显物质的水裂解成夸克、胶子，再分离和冷凝成单质态的夸克、胶子，为冷沸材料提供最基本的原材料。

但由一般的高温高压，不可能让水裂解成夸克、胶子看，可知类似搞笑。又如《百度学术》网李政的《论宇宙最基本的物质基元 L 粒子兼论暗能量、暗物质以及广义的物质构造》说：宇宙最基础的物质基元 L 粒子就是暗能量；阐述 V 粒子和 L 粒子的关系，研究能量、物质、暗物质和暗能量的关系，解释量子纠缠现象，指出引力场、电场、磁场都是暗物质；在此基础上提出广义物质构造的假说，所得到的暗能量、暗物质、普通物质的比例，和天文观测几乎一致；此外预言夸克核就是磁单极子、胶子与光子对称，阐述宇宙膨胀的循环机制等。但这也类似搞笑的简单化。

因为我们前后经历 50 多年的探索证明：用环量子自旋的面旋、线旋、体旋的符号动力学进行编码，以“量子避错编码”编码夸克、胶子、电子等全部显物质基本粒子，以“量子冗余码”看待暗物质粒子，以下还有很多层次的物理数学机制，这都不是 V 粒子和 L 粒子的简单关系。而且在上世纪 80 年代初讨论“物质无限可分”说中，我们与中科院哲学所的金吾伦教授认识，到 2002 年我们出版类似总结“物质无限可分”说追踪暗物质 40 余年的 70 余万字专著《三旋理论初探》时，金吾伦教授才给作了《序》。在《博览群书》杂志 2003 年第 2 期发表的《毛主席与物质无限可分说》，也证实跟杨明震教授说的，有像北京蒋春暄的地方，但推导又是完全相反。因为该文开篇就说：“中国科学不需要建立‘通天塔’，毛主席亲自领导和发动的物质无限可分说世界科学大战，是他领导中国人民和中国科学界的将帅们向诺贝尔科学奖冲刺的一次伟大尝试。这场‘战争’虽然远没有结束，但它已使中国的认知天平发生了巨大倾斜；然而沿着这块斜面向上攀登，确是一座通天塔。这就是中国科学界应该认真总结这场‘战争’的现实意义”。

这种感受，从前杜邦院士沈致远先生到美国定居的追求也可以看出。蒋春暄先生在《“蒋春暄空

时图”是划时代的》一文中，提及沈致远先生说：

“早期在研究核子强相互作用时发现，将粒子当作弦可以解释一些物理现象，但存在超光速粒子等问题，而未引起主流物理学家注意。弦论是物理学家在玩数学游戏，弦论者提不出任何实验验证，只是纸上谈兵，在数学中找物理学规律。目前国际一批庞大弦理论队伍还要继续研究下去，但是这个题目没有任何前途”。但这只是蒋春暄先生断章取义沈致远先生的《弦圈之争——基本粒子研究进入“战国时代”》一文中的内容。这里虽然沈致远先生和蒋春暄先生都一样不喜欢弦论，但沈致远先生其实与蒋春暄先生有本质的不同。沈致远先生并不是力挺文化大革命，对待弦论实际是属于力求客观和认真去调查研究的态度。

在《弦圈之争》中，沈致远先生说：弦代表超弦理论（简称弦论），圈代表圈量子引力论（简称圈论）。两者均为“万物之理”之候选者。万物之本是什么？20 世纪步步深入分子、原子、原子核、核子、电子、夸克……1970 年代物理学家从已知的基本粒子及其相互作用总结出标准模型，这是一个非常成功的理论，为许多实验所证实，但有两个缺点：一，其中包含人为设定的几十个参数，不知其所以然；二，虽然在四种作用力中已将电磁力、弱力、强力统一起来，引力却顽固地拒绝统一。物理学家深信四种力是统一的，在夸克和电子等基本粒子后面肯定有更基本的东西。于是经过两次“超弦革命”，聚集物理学家和数学家数千人，发表论文以万计！弦论认为：万物之本是极其微小（普朗克长度 10^{-35} 米）的弦，在 9 维空间中飞快地振动。现实空间只有 3 维，多出的 6 维空间卷曲隐藏起来了。

弦不同的振动式样相当于不同的粒子。其次，除圈论外，还有旋子、扭子及非互易几何诸论。圈论 1980 年代提出，从事者也仅数百人。圈论认为粒子是空间的拓扑形体。一言以蔽之：万物皆形。早期在研究核子强相互作用时发现，将粒子当作弦可以解释一些物理现象，但存在超光速粒子等问题。1984 年解决了存在问题，并发现弦论中自动出现引力子。弦论从冷门一变而为显学。1995 年威腾提出“M 理论”：9 维空间中弦论五种版本在 10 维空间中是等价的，除弦以外还有膜等。第二次革命后十几年过去，弦论基本方程仍付阙如，其可能方案竟然有 10500 之多，批评者讥讽说：弦论从万物之理变为“任意之理”。说到这里沈致远先生虽然认为：弦论者总可以变出一个理论使之与实验符合，无法证伪，就不是科学！但他仍然深入去调查，发现 20 多年来弦论和圈论等各自发展。圈论者推出两本书，一本是施莫林的《物理学之困境》，说弦论没有实验证明，连实验方案都提不出来。另一本是吴易特的《甚至称不上错》，说弦论根本不是理论，

连错都不够格！

弦论不甘示弱，格林 2006 年在《纽约时报》以长文进行反驳说：弦论继承爱因斯坦未竟之遗志，建立起美丽而严密的数学体系，是统一四种力的最有希望的理论。对“弦论 20 多年未出成果”的批评，格林嗤之以鼻。沈致远先生认为：弦论的大问题是实验验证，弦的尺度是 10^{-35} 米，以实验直接验证，所需粒子加速器比银河系还大！弦论提出的一些间接实验方案至今无一成功。但沈致远先生也去专访施莫林，问圈论和弦论有无共同之处？施莫林说：“圈论可以帮助弦论成为不依赖于背景的理论”。沈致远说：弦论发展出许多数学工具，圈论可以借鉴。施莫林表示同意。

沈致远先生还去问过吴易特：你对格林的反批评有何评论？吴易特说：“格林理会错了，施莫林和我都没有要求放弃弦论，只是主张给圈论等以一席之地”。由此，沈致远先生发现弦论与圈论不是学术之争而是学派之争，因为问题除学术歧见外，主要是社会因素：弦论是显学，占据一流大学物理系要津，几乎囊括了这方面的研究经费。圈论等缺乏研究经费，年轻的粒子物理学家如不做弦论，求职非常困难，资深的也难成为终身教授。在中国，弦论与圈论本是同根生，都源于毛主席的物质无限可分说的引导，而得到统一。反对弦论与圈论者，主要源于“以苏解马”。

抚顺机电职业技术学院退休干部高守研先生认为，由前苏联理论界编撰钦定的教课书《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版本，“以苏解马”没有抓住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现代唯物主义“已经根本不再是哲学”。马恩原旨原味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本质是努力把人们引上真正的科学研究的轨道。

但文革思潮熏陶，例如蒋春暄先生在 1976 年 2 月，发表的《超光速粒子的因果律的探讨》论文可以看出，他热衷用“黑体字”来指导科技数理写作，以奇想代替艰苦的科学研究工作。因为 $j^2=1$ 和 $i^2=-1$ 的算子本质不一样， $i^2=-1$ ，是科学发现的前进，在实数的基础上承认存在虚数。而 $j^2=1$ ，只承认有正实数和负实数，是拉历史的倒车。以致难以认可十年文革后，我们国家已经的拨乱反正。

如果把李世春教授研究魔方旋转的方法，与基因的“转座子”旋转比较，并扩大延伸到魔环、魔球，再联系四色定理对证明的要求不同，也可以看出前沿现代科学需要联合使用的三大特征：实践、观察、约束；而且这一个也不能少。而前苏联理论界编撰钦定的教课书《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版本，“以苏解马”之所以出错，是把“观察”排斥在马克思主义物质观之外，认为“观察”是唯心主义，与客观物质无关。实际“观察”是自然的

一种客观本质，即任何客观物质，它一边在释放信息的同时，另一边也存在被别的客观物质，对它在作记录。这正是自然坐标方位、质量速度、时间矢量的自然起源。说白了，“观察”是一种“学习”。而“以苏解马”把实践绝对化，认为实践可以纯粹代替学习。“以苏解马”本质是一种“独统”思想，认为战争可以解决一切问题，不承认科学是生产力，不承认科学家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因此也是存在人类战争的一种根源。这类似遗传基因，在生物细胞内染色体上的定位，是直线排列还是环圈排列不是绝对的，绝对的因素是实践、观察、约束等三大特征的三旋。

再说在文化大革命发生之前，毛主席生前已对物质无可分说，升华到强调“科学实验”，且要结合他的“实践论”和“矛盾论”，这三者是紧密联系起来的。这不难想到毛主席 1937 年在《实践论》中说的话：“你要知道梨子的滋味，你就得变革梨子，亲口吃一吃。你要知道原子的组成同性质，你就得实行物理学和化学的实验，变革原子的情况”。这里如果联系物质无限可分到夸克禁闭，夸克颜色禁闭到黑洞熵，黑洞熵公式到面积包围，面积包围到暗物质引力，物质引力到希格斯质量机制，质量机制到体旋倾斜，体旋倾斜到正切三角函数，正切函数到量子避错编码与冗余码，这其中的复杂性，才能理解毛主席说的要知道梨子滋味就亲口吃的深刻含义。

所以《博览群书》杂志发表《毛主席与物质无限可分说》一文中还说：“四人帮”打倒之后，第一位著文表明对物质无限可分说持怀疑的人物，是第三部门的上海 66 级高中生曹南薇，她文章刊登在《文汇报》上。这以后，第一部门和第二部门也有像杨明震、金吾伦等学者，持和曹南薇相似的观点。随着“文化大革命”的结束，应该说，我国的政治家们对过去工作中的不实之词，还是进行过认真的检查。相比之下，中国科学界的领袖和将帅们对我国自然科学理论，服务于已证明是错了的政治需要的不实之词所做的清理是很不够的。今天我们去读《蒋春暄的博客》中的《“蒋春暄空时图”是划时代的》一文，感觉不到是毛泽东思想在指导。例如，蒋春暄先生说：从“蒋春暄空时图”可推导出超光速所有的结果，这是人类第一次对超光速研究结果。2004 年他发现引力子可转变为静止质量，这样星体质量增加，离心力加大，它向外膨胀，整个宇宙都在膨胀。月亮中心、地球中心、太阳中心是另一种新物态，它的强引力比核子内强引力还要大，恐龙的消失可能是由于地球中心巨大能量放出而引起的。欧洲核子研究中心的大型强子对撞机不会找到希格斯粒子。希格斯粒子不存在，不需要暗物质和暗能量。从“蒋春暄空时图”得出的结果完

全有实验根据，“蒋春暄空时图”将流芳百世的，划时代的。

但 2014 年欧洲核子研究中心大型强子对撞机的实验，却得出有希格斯粒子的结果。所以蒋春暄先生哪有一点正常说话的样子。然而我们也要说蒋春暄先生不屈不挠的精神，也使我们深深地理解了：历史、党史和科学三者之间也是统一。芝诺坐标系，用 X 轴代表物质与真空，用 Y 轴代表思维与存在，作成平面直角坐标系。正向表示不需要会理解的思维与存在、物质与真空，负向表示需要会理解的思维与存在、物质与真空。如此构成的坐标系主要是为了区分万事万物中思维与存在、物质与真空的界面。实数和虚数对应这种界面，科学和历史、党史，本来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类事物，实际它们也是三类人体计算机。但也能用虚数和实数对应这种界面，而实数里面还分正实数和负实数，科学和历史类似两类不同的人体计算机计算记录，而党史这部人体计算机在科学和历史、党史三者之间，还有操作科学和历史这两类不同的人体计算机的功能。这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现象。

毛主席在 1913 年长沙师范学校读书时起，与杨怀中、何拔儒等老师交流，和 1918 年到北大图书馆工作时查历史文献，就深知此道。后来毛主席把这种芝诺坐标系同马克思、列宁哲学的思维与存在、物质与意识讨论联系起来，想指导中国科学的暗物质研究。这正如 2015 年在美国加州大亚湾中微子项目获得“基础物理学突破奖”后的中科院高能所所长，王贻芳教授说：“科学，就是要不一样！”。中国不抄袭别人的设计，这是做科研最基本的底线，别人已经想到的、已经做到的就不做了。

今天研究人类社会的历史、党史是统一的，科学理论自身是统一的，而且这两类之间也是统一的。从物质无限可分到芝诺坐标，从雪域蜀山之王贡嘎山到非洲的多贡人，从湖广填四川到 1911 年的保路运动，张澜、王右木、吴玉章、杨闇公等中国的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就想组织中国共产党，想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有人说毛主席的物质无限可分思想，是只沿袭马列的对立与统一论。这也不确切。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哲学教研室主任林娅教授说：列宁的帝国主义是无产阶级革命前夜的理论，本质是一种分裂对抗的全球化观念，是一种相对封闭的世界体系理论。这种理论从当前的现实出发，强调了世界政治军事斗争与对抗在武装阶级革命中的作用，从而导致了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在现代化进程中，长期坚持闭关锁国的发展方针和策略，最终窒息了社会主义经济文化发展的活力。中国不是这样。

要知道梨子滋味就亲口吃

2015 年迎来巧的是，暗物质追踪 60 年，在可

以收网的这种暗物质研究的热烈氛围中，我们已发表的博文《夸克禁闭四色定理新解》和《魔方四色旋转证明应用大爆炸》，论证了暗物质无处不在，就在原子核内的质子和中子等重子里，夸克色禁闭类似裸黑洞的裸奇点，作为“点内空间”有类似的暗物质。这是一种隐藏着大量虚粒子的夸克和胶子的“海洋”，暗物质是真正类似“量子冗余码”性质，与或虚或实的夸克和胶子是“量子避错编码”性质不同。这里毛主席的“实践论”、“矛盾论”和“科学实验”的思想，充分地体现了出来。例如，暗物质是“量子冗余码”，存在是矛盾的。但类似超导物质中的库柏对，不是也能解决矛盾。

其次，如在传统计算机算法中，单位信息比特，0 或者 1 两种值，只可能是分开的。但量子计算机却解决了这种矛盾，一个量子的比特，能同时任意叠加 0 和 1，使得计算系统更快，更强大。还有在文革前我们读大学时，看到一本《量子电动力学》书后面介绍一位叫“缪”的外国科学家，他计算：如果一个球体质点量子，自旋速度达到接近光速，离心力就会自然加速使它变为环圈。三旋理论正是利用环状而不是使用球体在增大量子信息量。因为球体只能在轴上旋转，球体旋转时没有办法得到每点的相反点，即轴上的点如南极点和北极点是不动的。环状上的点而不是轴上的点还有一个优势，环状的表面积比球体大，从数学角度讲意味着有更多不同的点可用作编码信息，暗藏着一种更有效和可靠的量子信息传送方式。量子传输是一种不用传播物质就能将信息进行量子纠缠的方式传播，有效地减少了量子传播中所需的能源和精力，同时提高了信息传输的可靠性。在超密量子信息的远距离传送中，利用它们共享的超纠缠量子信息编码组，可将一个特定的状态发送给远处。等等。

以上不同于专业科学家的天文观测法、间接探测和直接探测的办法。因为专业科学家们的前者，是探测暗物质相互碰撞产生的普通物质粒子信号，通过地面或太空望远镜探测；后者，是用原子核与暗物质碰撞，探测碰撞产生的信号。这与我们说明原子核内的质子和中子等重子里，夸克色禁闭类似裸黑洞的裸奇点，作为“点内空间”有类似的暗物质考察不同。当然这里，我们只是把专业科学家的天文观测法的暗物质起引力作用的结论，转移类比引用到解释亚原子现象上。这种猜想即使是“假说”，也能不断将这些猜想与实际观测数据进行对比。只有观测数据，才能将双方逼到绝境，激发灵感，创造出高度直观的结构，形成现代物理学的基础。毛主席的“实践论”、“矛盾论”主要指导和实践的是社会科学内容，但其中讲要知道梨子滋味就亲口吃，则能“声东击西”在科学实验上，化腐朽为神奇。

如果暗物质，是禁闭在，原子核的质子和中子等重子里的夸克颜色的黑洞熵面积内，那么暗物质就在我们身边。从类似 1917 年加拿大海港城市哈利法克斯的点源非核大爆炸，到 2015 年天津滨海港瑞海物流的点源非核大爆炸，都不能觉察不到暗物质，通过引力影响普通化学反应的影子。所以仅仅是为了自己的身体，和国家，尊重暗物质，敬畏暗物质，认真学好现在的前沿基础科学，也值得。不懂得毛主席讲要知道梨子滋味就亲口吃，包含有“声东击西”，就连经验丰富的资深科学研究者，偶尔都会栽在科学工作上。因为任何一个科技强国的成长，都不是一帆风顺的。政治与科学纠缠，“量子模型”包打天下不行，“北京猿人”包打天下也不行？为啥？

例如 2015 年 11 月，安徽省东至县华龙洞古人类遗址，发掘出包含 1 件古人类头骨化石。专家称，华龙洞遗址是继周口店、蓝田、和县、南京之后，在中国发现的又一处重要的直立人化石地点。这里漏掉了新中国刚解放的 1951 年，邓小平同志从抓人类上古史大统一方向，领导发现的轰动世界的“资阳人”头盖骨化石。这是巩固和深化量子突破口战略，为毛主席的物质无限可分说发展的双赢打下的第一个基础。“资阳人”化石涉及人类文明起源与中华文明“中国梦”的伟大复兴，解放后邓小平主政西南局，李井泉主政川西，修筑成渝铁路，成都与重庆争“资阳人”化石掌控权，邓小平没有在涉及人类文明历史的理顺和国家未来发展前途上让步，这恰恰说明，邓小平同志是能正确处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和“俄国红色的社会主义”的政治矛盾与关系的中国共产党领袖之一，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必然胜利。

邓小平把“资阳人”化石，让张圣英直接交到北京专家手中，这既是对国家级专家的鼓励，也给国家级专家和“北京猿人”研究出一道难题。因为毛主席抓的原子核子物质也可分的物理学大统一，和他要配合毛主席的战略抓的人类上古史大统一，是两个不可分割的整体，是为人类和国家的命运开辟了广阔的发展空间。但为防范国家科学殿堂内专家研究也难免有的失误，邓小平同志从以前党内高层处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和“俄国红色的社会主义”的政治矛盾与关系发生的“路线斗争”的现象中，已经敏锐地预见到，即使掌了权，抓物理学大统一和人类上古史大统一，也不会一帆风顺。事实正是这样，如果“北京猿人”化石丢失是在解放前，掌控权并不全在我党专家手中，那么“资阳人”化石的发现，完全是我国掌控的解放后，就不应该出问题。但到今天连“资阳人”化石发现的时间、地点，是否是化石，“资阳人”是男是女，“资阳人”出现的时间是 3 万年前还是 7 千年前，

等等，专家和媒体都还是众说纷纭，这又怪谁？今后还会发生吗？人们并不能肯定。

《成都日报》2012 年 3 月 19 日发表的《张圣英 江陵才子掘出“资阳人”》一文中说，张圣英（1903—1992）最大的贡献莫过于 1951 年发现资阳人头骨化石。1953 年，张圣英到北京参加中科院主持的资阳人头骨化石论证会，据发现的古生物化石分析，他大胆地得出一个结论，四川古时是海，成都是海的中心，而资阳一带则是海的边沿。随后，周恩来陪他去毛泽东家里吃饭做客，毛主席对张圣英说，资阳人头骨化石是国宝，他发现了迄今为止中国的第三颗人头骨化石，对中国，乃至对世界都是很大贡献。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应该完全肯定，但没有十月革命就没有中国共产党，没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了吗？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土壤，应该说，这和出生邓小平的他家乡四川远古盆塞海山寨城邦文明和海洋文明分不开。

2011 年 3 月 12 日，《重庆日报》在头版发表了新闻稿《91 年前的今天 中国最早的共产主义组织在重庆诞生》，并以整版篇幅发表了长篇报道《“重庆报告”：中共创建史上的一个未解之谜》和专家学者对《重庆报告》的评论；2011 年 3 月 13 日《光明日报》也发表《我国最早的共产主义组织成立于重庆》。这份重要文献的发现，为中共早期组织史、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史做出了重要贡献，同时也证明了中国先进知识分子选择马克思主义是历史的必然，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和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必然。事实是，1921 年 6 月列宁派马林来中国正式建党的消息，张澜从李大钊那里知道后，张澜与吴玉章、杨闇公、王佑木等研究，由王佑木在 1920 年 3 月 31 日那份给共产国际原稿上修订，1921 年 7 月 31 日王佑木完成中文报告的定稿，张澜 1921 年 8 月 10 日带到北京。北京大学教授杨怀中（1879-1922）是张澜与何拔儒的留学同学和朋友，张澜通过他作掩护找北京大学的李大钊。李大钊找到张圣英（1903-1992）完成俄文翻译稿后，8 月 14 日就带张澜一起见面见共产国际代表马林（1883-1942），把中文稿和俄文翻译稿一齐送给他。马林同意将《重庆报告》和上海“一大”材料一起转交带回莫斯科。但马林建议解散重庆组织，以个人名义愿意的再加入上海组织。马林的意见带回重庆后，王佑木、杨闇公、吴玉章等大多数人同意解散重庆组织，先后重新申请加入上海组织。张澜等少数没有想再重新申请加入上海组织。由此重庆组织不再存在，并决议不允许任何人以重庆组织名义活动。

之所以找张圣英作《重庆报告》的俄文翻译稿，是 1918 年他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在校期间结识李大钊先生，并成为马克思学术研究会 7 名发起人

之一。在 1921 年北大毕业前，张圣奘都与李大钊交往密切，还认识在北大图书馆工作的毛泽东。张圣奘生于湖南新化，他的叔父张国淦是北洋政府高官，张圣奘自幼随叔父张国淦长大。张圣奘早年在天津南开中学读书，与周恩来有同窗交谊。1922 年张圣奘到英国、法国等欧洲国家留学，在德国期间又与周恩来重逢，友谊加深。1922 年张圣奘到法国巴黎参加社会活动，经周恩来与邓小平结为朋友。

事实说明，后来张圣奘一生多变，社会关系复杂，但他始终没有暴露《重庆报告》的内容。所以 1951 年邓小平请张圣奘把关成渝铁路修建中的文物，也是对他可信的认可，而使他发现资阳人。其实社会主义和共产党不神秘，在亚洲 20 世纪初就有影响和传播。现在从 1920 年“重庆组织”案到 1935 年“盐亭就义”案，解开这个谜底的是，为什么在川北偏僻的盐亭县龙潭山区短短的 1929-1935 年间，能组织 1200 多人的地下党游击队革命武装？它和《重庆报告》中说的“建立一支红军队伍”有没有联系？又是怎样的一个联系？首先“重庆组织”案与四川保路运动有关，它的很多骨干后来都参加了 1920 年成立的四川省重庆共产党。

即使“重庆组织”解散后没有再参加“上海组织”，他们中有的还是让自己子女后来参加“上海组织”。例如邓小平生父邓绍昌先生（1886-1936），清末毕业于成都法政学校，1911 年张澜、吴玉章、蒙公甫、王济钦、何拔儒等在成都、盐亭领导保路运动，邓绍昌也在广安县奔走呼号积极响应，是广安县保路同志军的首领，也成为张澜、吴玉章等在广安县的依靠对象。1912 年四川成立军政府，张澜出任四川军政府川北宣慰使，使署设于南充。1913 年 4 月，张澜当选为中华民国国会众议员，结识蔡锷。1915 年袁世凯称帝，蔡锷在云南起义，张澜联络川军师长钟体道响应，在南充宣布独立。1917 年被北京政府任命为四川省省长。这时邓绍昌先生已是北京政府领导下的四川省广安县的团练局长。1918 年张澜离川留居北京，作为张澜手下的革命党人的邓绍昌受到排挤，团练局局长被撤换。邓绍昌先生其后在广安协兴场家里，一心经营 200 多挑田地的祖业和从事一些酿酒、粉坊和缫丝的生意，但 1919 年到 1920 年间，仍多次到重庆寻找张澜、吴玉章指引出路。1920 年初，张澜、吴玉章介绍邓绍昌加入成立的四川省重庆共产党。在这之前 1919 年夏，邓绍昌得知重庆总商会会长汪云松等要办重庆留法预备学校的消息，在请张澜、吴玉章等帮助下，毅然把 15 岁的小平送进这所学校读书，使小平从此走上了救国救民的革命道路。

再说中国保路运动，是清末川、湘、鄂、粤等省人民进行的反对清政府迫于帝国主义掠夺中国铁路主权的压力，卖国丧权出卖铁路主权，激起全

国人民坚决反对的爱国运动。1910 年，英法德美四国银行团逼清政府订立借款修路合同。1911 年 5 月 9 日，清廷在邮传大臣盛宣怀的策动下，宣布“铁路国有”政策，将已归商办的川汉、粤汉铁路收归国有。四川修筑铁路的股金，不仅来自绅士、商人、地主，还有农民，而且农民购买的股份占很大比例。清政府颁布“铁路国有”政策以后，收回了路权，但没有退还补偿先前民间资本的投入，因此招致了四川各阶层，尤其是广大城乡劳动人民的反对。其中还有盐亭范仲纯、范蜀林等人，用马克思主义的宣传鼓动，从而掀起了轰轰烈烈的保路运动；其反帝反封建应该说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一个最早最基本的特点，所以说 1911 年的中国保路运动是它最早的体现。

今天来研究保路运动、四川保路同志会、四川保路同志军，从表面上看，好像是由富人、立宪派、同盟会等阶层组织、领导干的，和辛亥革命是同一个性质，是辛亥革命的前奏。实际引入“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与“俄国红色的社会主义”两种版本的特征看，它是和辛亥革命的性质还有区别。一方面反清的四川保路同志军类似民间武装，它由部分富人、立宪派、同盟会的成员领导参加，但另一方面主要是有大量的农村穷人和城市贫民自发参加，这是少量的富人、立宪派、同盟会阶层人物不可比的。其次，发动组织领导这些自发参加的大量的农村穷人和城市贫民中，正是还有后来《重庆报告》说的近 40 位正式成员和一批候补成员的“重庆组织”，他们是一些拥护马克思主义的教师、工人，分布在川西、川西南、川东南、川北和川东的成都、宜宾、雅安、顺庆南充和重庆等地。

他们的奠基，为后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中国共产党诞生奋斗，培育了新人。如新中国诞生的十大元帅：朱德（1886-1976）、彭德怀（1898-1974）、林彪（1906-1971）、刘伯承（1892-1986）、贺龙（1896-1969）、陈毅（1901-1972）、罗荣桓（1902-1963）、徐向前（1901-1990）、聂荣臻（1899-1992）、叶剑英（1897-1986）中，有 9 人都是中国保路运动尤为激烈的川、湘、鄂、粤等四个省中涌现的，并且也是以激烈程度排序出现的。四川 4 人：朱德、刘伯承、陈毅、聂荣臻。湖南 3 人：彭德怀、贺龙、罗荣桓。湖北 1 人：林彪。广东 1 人：叶剑英。这不是偶然的，它说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中国共产党自有它的根基。

1918 年李大钊当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放飞的毛泽东；李大钊也类似放飞张圣奘。从自然科学一方面造福人类看，当时毛泽东没有条件学科学，但毛泽东从湖南农村走出，他在北大图书馆却不时注重中国古代文献中的物质可分科学，联系西方自然科学的发展，这是不同寻常的。由此可知毛泽东

在当时和后来能想到的中国古代文献中的物质可分科学，实际已在领导开辟前沿科学物理的大统一。这也是新中国解放不久，他就重视原子弹、氢弹的科学和科学实验，是联系在一起。但 1917 年后的形势，和当时的第一要务是“俄国红色的社会主义”压倒“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但四川之所以要湖广移民来“填”，是因国家内乱：明末清初的 30 多年间，四川、重庆境内，战乱频发，加上灾荒、瘟疫不断，造成重庆、四川人口锐减。

在“湖广填四川”之前，四川就存在上千年的厚重的本土文化、生活方式、生产技术和上古文明，如都江堰水利工程、嫫祖丝绸带路经济、盘古法天法地文明等。移民四川，针对的是荒芜的开垦和生产的恢复，所以无论穷人和富人，还是官方和民众，都认可“勤劳”，维护本土经济的自我发展。所以保路运动不单纯是反帝反封建，还带有保护本土经济自我发展的愿望强烈，革命态势才发动得如此广泛，而且快。1903 年在日本东京弘文师范学院留学时，张澜与何拔儒、陈润霖、杨怀中、黄兴等同学是交的朋友。1913 年至 1917 年何拔儒到长沙四师、一师任教，既是陈润霖、杨怀中的推荐和邀请，也是张澜的派遣，到湖南考察和收集川外革命组织的发展情况，联络感情，为四川创建共产党组织做准备。

在这里何拔儒的最大收获，是认识和了解到在此期间读书的毛泽东等革命青年，看到青年是革命的未来。1917 年俄国十月革命爆发后，张澜受到很大的震动和启示，从想建革命军队，突然意识到了列宁的建红军队伍的模式。这个过程是一个艰难的转变。“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邓小平同志独立提出来，而且他想了很多年。“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最初出发的基本点，就是要治理中国的“内乱”，甚至是要解决所谓中国历史存在始终无法摆脱的“治乱循环”。这是没有俄国红色的社会主义在世界、在时代的出现，中国也必然要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法治的选择。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远古联合国的解散或瓦解，是由于距今 5000 年左右四川盆塞海的内陆，这是自然灾害造成的。克服自然灾害一要顺应自然，二也要发展自然科学技术。这是两种智慧：一是人文智力，二是科技智力。

智慧智力需要智力种子和播撒智力种子。盐亭的存古学堂早于 1902 年张之洞向清廷最早提出建立的存古学堂的理念，也早于四川其他地方存古学堂在 1902 年就有的开办，就因为西（充）盐（亭）边境一带的山乡，大围坪地貌隔上三五里，往往就会有一座山寨。这些山寨是远古巴蜀盆塞海时代的海啸遗迹地貌遗存，在明末清初抵抗张献忠的乱杀中，还发挥过作用。在湖广填四川之后，一些原住

民家族，办的私塾书馆，在教传统官方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儒家学问时，特别是在盐亭南边的一些私塾书馆，还结合本地为抵抗张献忠，给予反驳他为杀人有理的回答是：“四川人出有嫫祖，发明养蚕缫丝；四川人出有盘古，建立的统一远古联合国，贡献天下大焉”，以此作动员。这种成功宣传的话语，也用来进行教学，以激励后人的存古大德。彭健修（1884-1953），盐亭高灯镇人。1909 年毕业于四川高等学堂成都优级师范文史政法选科。1911 年，因与张澜、蒲殿俊、罗纶友善，在争川汉路潮中，彭健修任罗纶的团部书记。1912 年应张澜的特邀去南充中学任教史地 4 年。1914 秋彭健修应好友张澜推荐，到广安中学教史地。1914 年至 1919 年岳鹏程跟着彭健修第一次去广安中学任教。这期间邓小平考入该校就读。因邓小平父亲邓绍昌在成都四川法政学堂读书时，就和同时在成都优级师范读书的彭健修认识。邓绍昌的同学袁焕仙，就是彭健修的盐亭同乡、同学。他们常来往视若兄弟；后来他们又一起参加张澜、蒲殿俊、罗纶等人发动的保路运动。1920 年经张澜介绍，邓绍昌、彭健修、袁焕仙和岳鹏程，又都加入“重庆组织”。

再说毛主席的父亲毛贻昌先生，字顺生，生于 1870 年逝世于 1920 年。1886 年 16 岁的毛贻昌先生就曾外出当兵，退伍后回乡务农，17 岁时就开始当家理事。毛贻昌先生 20 多岁的时候，家里还穷困潦倒，他与妻子文素勤所生的第一个儿子夭折后，1893 年、1896 年又相继得到毛泽东、毛泽民两个儿子。人口的增加使得他的生活压力加重，加之负债，1902 年至 1904 年毛贻昌先生离家到外面参加湘军打拼。1911 年保路运动前的 20 世纪之初，洋务运动的新思潮已渐浓，毛贻昌参加的是湖南的新军，几年的军旅生涯下来，让他的眼界大开。毛贻昌受新军中新思潮影响，长了不少见识，也积累了一些银钱，回家创业，赎回老人典出去的土地，不久又买进一些，增加到 22 亩，每年能收 80 担稻谷，并开始把目光转向商业领域。

毛贻昌善于经营，后来又集中精力去做稻谷和猪牛生意。他最早是从做米生意开始的，大米的初加工，慢慢地利润逐渐滚动，产业也渐渐做大。于是又开始涉足猪、牛的买卖；在牛生意方面，他采取的是“双方自愿，双方有利，风险同担”的办法，即他把母牛买回来后“承包”给他人喂养，养户获牛力、牛粪，主户获牛犊，再出售牛犊或者喂养长大后出卖，从中获利；如果中途意外，牛死了，那么就由两家平均分担损失。毛贻昌先生继续把钱用在生意投资上，并在银田寺的“长庆和”米店入了股。他还或多或少地雇用长工、短工。1908 年毛家资本逐渐滚到两三千元，毛贻昌先生自制了一种叫

“毛义顺堂”的流通纸票，开始发行“毛义顺堂”股票，并较大规模地使用股票，把邻里乡亲的余钱收集起来，以期增值；发给雇用者使用，则作为工资，可以暂时代替银两；发给生意同行，又成为定金，或者物值。

在小小的韶山冲，毛贻昌可算是个小康人家。但自从 1915 年毛泽东到一师读书参加学潮，揭露校长张干，执笔起草《驱张宣言》传遍整个长沙城，惊动省府衙门。以及 1915 年毛泽东组织一师校友会，编印反袁传单，在校内外广为散发，直至 1916 年袁世凯死。而且毛泽东受父亲曾从军熏陶，显示继承的军事“天赋”，1916 年积极报名参加一师学生志愿军，任连长，再到 1917 年毛泽东首次用兵，在南北军阀战争长沙军阀傅良佐被桂军谭浩明赶走期间，指挥学生兵护校护城，一百破三千，展示不同凡响的军事才能，事后被一师的师生乃至长沙的警察，都说成是“一身是胆”。毛泽东在校外频繁社会活动影响，也扩大波及到毛家，自 1917 年后的几年中，毛贻昌家发生几次被败兵勒索，又遭强盗抢劫，妻子文素勤妻子多年的病痛日益加剧。

毛贻昌先生面对逆境咬紧牙关，继续支撑家业，而且更加关心公益活动。1919 年韶山韶河上修筑石拱桥，毛贻昌先生积极参加修桥义务劳动，并慷慨解囊捐献，当年捐献的 7 个集体和 8 位个人，共捐银洋 108 元，一般人家捐一两元，而毛贻昌先生捐了 4 元，居个人捐款的第三。所以学生时代的毛泽东，实际是受到过他父亲的影响很大，毛泽东也心知肚明清楚他们父子间事业的关系和相互影响。1910 年毛贻昌先生为使家业后继有人，曾送毛泽东去湘潭一家米店当学徒，当时毛泽东求学心切，请亲戚和老师周旋，毛贻昌先生同意毛泽东去湘乡东山小学堂学习。毛泽东从小听惯父亲摆谈新军和大城市中思潮的趣事，因此 1911 年初毛泽东到长沙考入湘乡驻省中学读书，当年四川、湖南等地的保路运动能很快感染年轻的毛泽东。1911 年 10 月辛亥革命爆发，清王朝被推翻，毛泽东也第一次证实父亲曾密告过他有孙中山和同盟会的传言，自此敢大胆在学校大门口张贴设想由孙中山当总统，康有为当国务总理，梁启超当外交部长来组织新政府的大字报。到 1911 年 12 月底，毛泽东干脆也学父亲从戎，成了湖南新军第 25 混成协（旅）第 50 标第一营左队的一名普通列兵，直到 1912 年 5 月退出。因程潜是湖南督军府的参谋长、军事厅长，以后毛泽东还称程潜为自己的“老上司”；直到 20 世纪 60 年代初，毛泽东还说：“瞄准、射击等那几下子，还是从程颂公指挥的新军那里学来的”。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从毛主席的父亲毛贻昌先生到邓小平同志的父亲

邓绍昌先生，都是善良、勤劳、勇敢、正直、开拓创业的中国普通百姓，是数亿有良知的中国人的典型代表，即使在今天也是应该保护的小康人家。毛主席和邓小平同志领导闹革命，不是要革他们的命。但要知道梨子滋味，亲口吃梨子你才知道，从远古联合国盆塞海山寨城邦文明到张献忠农民起义兵败四川西盐边境山寨大围坪，从湖广填四川到保路运动，从辛亥革命到新中国解放，从抗美援朝到改革开放，道路是何等的曲折。依法治国、合作共赢、反对通赢通吃，也许在远古联合国盆塞海山寨城邦文明时，就已形成的共识，而且后来盆塞海干涸，文明迁徙到世界各方，但在中国先秦古典集大成的文献中，仍对应保留下类似道法自然和大同世界等思想。然而各方地缘及其它因素等的差异，人心不齐，有权就是知识，有枪就是知识，走向依法治国、合作共赢、反对通赢通吃共识的道路，暗礁、激流、险滩数不胜数。人类大脑类似钻头，人类世界也类似人体计算机，展现的结果是多元的。今天北京的学者，如黎鸣认为老子的道法自然才是正确的，而孔子的大同世界是虚伪和垂死的。上海同济大学的朱大可教授，则认为老子 and 孔子都来自印度人。北京女学者苏三的三星堆猜想，中华古文明都源自西亚的红海地区。等等。

所以如何来认识文化大革命，我们和力挺文革反相反量的蒋春暄先生及在美国的王令隽教授等人，是存在分歧的。我们赞同胡耀邦同志的认识，他代表的是中国共产党人的良知。例如，在纪念胡耀邦诞辰 100 周年撰文追忆爷爷的文章中，他的长孙女胡知鸷同志说：从 13 岁开始，爷爷为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事业，奋斗了整整 60 年。他工作的那个时期，他以博大无私的勇气，打碎了大批无辜人们遭受冤假错案的牢门。他在邪恶面前选择了正义，在逆流面前选择了良知，在误会面前选择了理解，在差异面前选择了比较和包容。从胡知鸷同志回忆爷爷给她“取名初议”中，可知中国共产党人对文化大革命的理解。胡知鸷说：她出生在文革年代，“那是一个视文化为糟粕，轻视学习的时代。爷爷对这种社会现状非常痛心，他希望年轻人要学知识，要懂科学的重要性，要有文化”。她的名字“知鸷”，就是胡耀邦同志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颇费心思为长孙女起的。

“知”是希望努力学习，以学习为乐趣。这也是胡耀邦同志对文革的一种反抗，希望年青人不再受欺骗，文化知识才是人类生存发展的智慧果。所以胡耀邦同志首先定了“知”这个字。“鸷”，鸟类之猛者曰鸷，胡耀邦同志希望她的性格，能像鸷鸟一样不怕困难，勇敢又坚强。为此，胡耀邦同志还特地写了一篇《取名初议》，其中这样解释胡知鸷的名字及寄予的希望：“既然要在人世间生存，

那就得从小努力追求知识，将自己一生献给人民，不要自以为是天才，并警惕为骗子所骗……人们往往把女孩子叫小鸟，女孩子性格一般又失之于柔弱，希望长大后性格要勇猛一些”。

可见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革命如要知道梨子滋味，亲口吃梨子中才能理解和学会“引蛇出洞”、“声东击西”的智慧。为什么要搞文化大革命，就是揪出林彪和“四人帮”，要学知识，懂科学的重要性，要改革开放，要依法治国、合作共赢。

References

1. Ma H, Yang Y, Young M. 暗物质. *Academ Arena* 2015;7(2):51- 54. (ISSN 1553 - 992X).

<http://www.sciencepub.net/academia>.

2. Ma H, Young M. 量子纠缠 (**quantum entanglement**). *Academ Arena* 2015;7(2):46-50]. (ISSN 1553-992X).
3. Ma H. The Nature of Time and Space. *Nature and science* 2003;1(1):1-11. *Nature and science* 2007;5(1):81-96.
4. 郭选年. 宇宙中存在大量的物质，并不存在大量的暗物质（论三十一）. *Academ Arena* 2015;7(8):9-10]. (ISSN 1553-992X). <http://www.sciencepub.net/academia>.

11/26/2015